

第44卷第1期(總第242期)

2017.6.30

每冊港幣30元



紀念六四 28 周年在香港
小圈子選特首多弊病 反證真普選的必要
回歸二十周年 香港被一面倒地抨擊
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病危的劉曉波
當局須即釋放無辜被囚律師和異見人士
簡評國務院的工作報告
印度歷來最大的總罷工
對韓國工會運動的鎮壓在日益增加

紀念六四28周年在香港 振言

一年一度的六四燭光晚會又舉行過了。這次的出席人數仍坐滿了維園六個足球場和旁邊的草地，大會宣佈的出席人數有11萬(警方循例低估說只有1.8萬人)，是9年來的新低，但仍顯示是1993年以來的新高；支持平反六四的訴求，28年來從沒有在香港停止過，這對六四事件的死難戰士遺屬是一種慰藉，對世界各地的關懷人士也是一種鼓舞。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5月22日至25日調查顯示，有7成半青年受訪者支持平反六四，遠高於受訪的中年及老年人，但不支持平反六四比率為27%，比去年上升了7%。

可是，中大學生會內閣「山鳴」於六四前夕發聲明，指「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悼念經已走到盡頭，六四需要被畫下休止符，悼念終需有停頓或結束的一日。」這引起一批校友發起聯署，批評其「無知、冷血與懶惰」。短短發起聯署兩天，已有2483人參與聯署。

這構成一股巨大壓力，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子灝仍要強辯，於商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稱，支聯會五大綱領從成立到現在沒有改變，質疑內容是否仍符合香港的社會氣氛和環境，指香港人身分認同亦已有大轉變。區又說，集會形式不外乎「獻花、播紀錄片、唱歌」，對平反六四及推倒一黨專政沒有實質幫助。他又稱是反對支聯會的集體悼念，但他可有單獨在中大帶領同學們舉行遊行和悼念活動嗎？不見他有！

區強辯說，晚會、遊行沒有實質幫助，那他又有什麼行動作出實質幫助呢？其實，燭光晚會和遊行已清楚顯示，在中國境內每年都有市民集體行動，反對中共的一黨專政，要求平反六四，恢復當年學生、工人、市民大眾爭取民主，反對官僚的正義聲譽；今日也要結束官僚獨裁，建設民主中國，中國有民主，香港也有得益，否則便會有如「8.31決定」等的束縛、壓迫，因為中港關係密切，不可分割的。說六四是「鄰國的事」，則提倡者又是什麼國家的人呢？！

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是正確的，但仍可修改或加上其他主張，開放給市民提出建議。

在另一邊廂，其他大專院校學生會雖然沒參加支聯會的晚會和遊行，但仍有5間學生會合辦討論會和其他相關活動，又分別洗刷民主女神像和國殤之柱，以及重油港大校內的標語。

社工學聯日前也發表宣言，指紀念六四不必在於中國人身分認同，強調八九民運對香港歷史和價值有絕大影響，「不是單純一件發生於遠在北方、不關於香港人的歷史」。

不過，港大國事學會雖也有辦六四研討會，出席的全國政協委員張家敏卻表示，中共控制天安門後絕對沒有屠殺，只有軍人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被人用石頭擲死，這就是六四真真正正的真相。他指六四事件共約202人死亡(轉引自今年六月五日《蘋果日報》)。死去的202人當然是被槍殺和刺死的學生、工人和市民，即使會有個別死去的軍人在此數字之內。但 標榜愛國愛港的人竟公然宣稱，六四沒有死人。這更是睜眼講大話，任意否認當時人所共知的史實。

在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今年仍有多間大專院校的團體和許多個別同學參加，有的更上主席台演說和歌唱，也有更多青年在晚會出現，這些都顯示薪火相傳，支聯會並不孤單。由此展望今年的七一大遊行，參加人數也不會很少的。我們願在此呼籲大家屆時踴躍參與！

06/06/2017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4卷第1期（總第242期）

2017年6月30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又到陸肆詩三首

陳仲禧

又到陸肆之一

送殯的人在前面呼喊
我這凡心卻堅持：
若塵歸塵土歸土
真理姓甚名誰？
朋友說：白癡或絕望比你好
不再水流不會澎湃不言激動
本來無一物才是智慧老人
被擋置千萬年的是真理
化境於我就是
無

16/5/2017

後記：

朋友間常勸我，老人家不要動氣，凡事看開，要「化」。但每年到陸肆，情緒都會激動，都很難「化」！所以，每年提起陸肆，我是無法有「化境」的了！

又到陸肆之二

相信愛就是美麗
暴力是絕望
信念是在沒有盡頭的苦難中尋找未來
流淚是盼望公義開花結果
自由和激情繼續
「愛裡沒有懼怕」
流淚是盼望公義開花結果
珍藏實証的人
等待黎明的月
永遠不會太遲或太早

22/5/2017, 30/5/2017修訂

十月評論 2017 第1期

又到陸肆之三

破碎的心越過山野
和平羔羊解開兩極死亡之結
破高牆
盼望在對話
目的是尋找饒恕的綠燈
「出路」的綠燈在於人民的幸福與社會
變革

26/5/2017, 30/5/2017修訂

後記：

眾所周知，陸肆影響了東西德的高牆倒下、羅馬尼亞的壽西思古暴政滅亡…被獨裁者統治下的人民，因這場學生運動的後果而人民勇敢的站起來，我們永遠都要記得！



小圈子選特首多弊病 反證真普選的必要

微波

香港第五任特首選舉已經揭曉，選前公認為中央欽點的林鄭月娥是勝出了。許多建制派選委都公開回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更不遺餘力支持，有的甚至說：「如不照指示投票，就是反對中央。」全國政協委員劉兆佳聲稱：張德江是人大政協時已「講得好白」，中央屬意林鄭做特首。

實行小圈子「選舉」，剝奪了3百多萬香港選民的應有權利，這已經是很不民主的做法；而且，更要強迫選出民望較低得多的林鄭月娥為特首，就等於把建制派選委的橡皮圖章角色再次顯露無遺。

選前的民意

在這次3位候選人的競選過程中，客觀中立的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林鄭是比曾俊華得分少很多的。

例如，由公民聯合行動發起，並由港大民意研究計畫進行的民間全民投票，在3月10日至19日在網上進行，並透過多個實體票站讓市民投票，結果共有65,106人參與投票，支持曾俊華為下任特首的比率91.9%，減去4.2%反對率，支持度淨值高達87.7個百分點；反觀林鄭支持率僅1.5%，反對比率達96.1%，支持淨值為負94.5個百分點，民望與曾俊華相差天共地。（引自3月21日《蘋果日報》）。

距離特首選舉投票只有一個星期，《蘋果》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畫就3名特首候選人民望作調查，結果顯示反對曾俊華做特首只有約7%，而反對林鄭月娥民意卻逾四成，較曾反對率多近5倍。令人意外的是，除了高學歷、中高薪專業人士、學生反對林鄭比率高外，林鄭在低學歷及勞工階層亦得不到支持，反對率同樣高過曾。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調查結果反映主流民意厭倦特首梁振英敵我管治手段，令林鄭難以得到社會不同階層支持。

此外，3名候選人在19日晚最後一次同場辯論，吸引逾500名選委到場參與，有選委認為林鄭月娥的執行力最強，傾向支持她，亦有泛民選委質疑，林太未能說服市民她將會如何聽取民意。《明報》找來多名專家分析候選人表現，以40分為滿分，曾俊華與上次電子傳媒論壇一樣，得分最高，有31.5分，林太則最低，有28.5分。

中央欽點的弊病

中央已指定林鄭為下任特首，主要原因應該是認為她忠實可靠，愛國愛港立場堅定，唯命是從，不會有任何抗拒，在港府工作時間長，管治能力頗高。在

林鄭上京接受任命後，還與主管香港事務的張德江和王光亞分別閉門會商3小時和2小時，討論和如何解決當前的香港實際問題，向她面授各種具體指示（包括組成班子的人選意見）。上任後，京官的指示將會繼續發出，顯示京官的間接治港作用將會更加發揮。林鄭月娥須加以緊密的配合。

不過與過去中央多次對上京的香港特首作出的「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的訓示不同的，習、李這次對林鄭的當面訓示都沒有「推進民主」這一句。這當然不會是「無心之失」（漏），而是顯示他們的不願香港實行民主，寧願林鄭專權霸道。

林鄭月娥上任後，為了彌補她在競選時的民望比對手曾俊華低非常多，需要先推行一些改善的措施，例如：及早宣佈上任後會由公帑每年增撥50億元作為教育經費，考慮擱置BCA措施，在上京接受任命時向習李反映港人對8.31白皮書的關注，在京接任特首後與民建聯、工聯會代表會晤時，據說曾就多項勞工議題均積極回應，如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推行劏一公眾假期為17日等，都有正面承諾。至於7月1日上任後能夠如何兌現這些承諾和競選時的政綱，那就要等其實際表現來證明了。

施政須以市民利益為依歸

新特首上任後，必須改正梁振英以鬥爭為綱的施政作風，實行以親和為貴，改善過去的行政當局與議員之間的惡劣關係，她和她領導的政府必須尊重香港社會既有的核心價值和正常的制度程式，尊重立法會內不同的政見和團體代表，願意接受市民監督和正確意見，理順官民關係。對於北京中央當局，她應該如實反映港人意見，為港人爭取權益。但她能夠這樣做到嗎？

總括來說，這次特首選舉再一次證明小圈子選舉的弊病：由中央操控，能夠迫使人數很少的選委必須依照中央指令投票，選出中央所屬意的特首；但如果是幾百萬港人都可行使應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則一定可以按照大多數選民的意願去選出特首，這不僅是充分民主自由的選舉，而且中央也難以橫加干預；如果是高票當選的特首，也不容得中央不予以任命，否則便暴露出其專橫無理，與港人相對立。

因此，港人在反對小圈子選特首的同時，必須全力爭取真普選特首，由全港已合法登記的3百多萬選民有權提名和直接選出，這樣才是充分民主的真普選，能夠選出最多港人擁護愛戴的特首。 20/04/2017

從特首選舉看機會主義的虛妄 大進

[編者按：在特首選舉前，泛民主派中出現了「原則派」與「務實派」，以下發表的是「原則派」論者在討論香港政局中的有關闡述。]

三月的香港特首選舉，對部分關心政治和追求民主的市民來說，是一場春夢。

三月廿四日傍晚，候選人曾俊華在中環搞造勢大會。成千上萬的支持者，揮舞閃亮的手提電話，跟站在雙層巴士上的前財政司曾俊華呼應著，就像演唱會樂迷般，叫喊著支持口號，成為曾俊華選舉工程的高潮，也許亦是他支持者的美夢，最甜美的一刻。曾俊華更宣稱，希望賦予集會這地點（中環）新的意義。對追求民主的民眾來說，真是頗堪玩味，百般滋味在心頭。曾經令香港風雲色變的「佔中運動」，是否也要詮釋新意義？

只不過是兩年前，數十萬市民在鄰近的金鐘，以及旺角和銅鑼灣堵路，不惜以身試法要求真普選，包括普選特首。他們不少一直堅守，直至最後被警察清場。

「雨傘」之後，民主運動墮入沉鬱的退潮。而特首選舉這一役，似乎又反映出主流民主政黨的局限：太依從「策略」考慮，缺乏持久抗爭的意志。

在特首「競選」期間，主流民主派一面倒支持曾俊華，這位來自建制的候選人。曾俊華在特區政府做財政司近十年，從沒帶來任何接近民間要求的措施；而他的競選政綱，亦缺乏對民主進程作明確的承諾。只因為另一個主要對手，是梁振英路線的林鄭月娥，主流的民主派便把林鄭月娥看成是主要矛盾，她亦成為所謂「梁振英2.0版本」。曾俊華在精明公關技巧包裝下，看來比較平易討好，變成「沒那麼邪惡」—— lesser evil 的選擇。

再者，林鄭月娥則被看成比梁振英更危險，因為她熟悉政府官僚運作，更能使出手段打擊反對派（選舉前，政府公布西九建故宮博物館分館計劃，繞過適當諮詢，便是這個分析的例證），如果她當選便像是對民主派的重大打擊末日。

當然這亦是主流民主派，似乎被「微妙」的政治形勢所愚弄：「人民公敵」梁振英「出奇地」宣佈不打算連任，來自內地資本的「成報」，近半年來狠批本港左派、建制、中聯辦和國內張德江官僚系統，認為這個利益集團，是本港的社會矛盾和民怨的根源。而奇怪地這個陣營也沒有作出反擊，似乎印證明了內地的派系鬥爭，或可讓本港民主派能從中掙取些本錢，甚或拉一派打一派。

本地主流的民主派像看到了一點點曙光：中央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估計中央習近平應是不滿梁振英的施政，同時又容許曾俊華參選，應顯示出中央可包容溫和路線。主流的民主派就孤注一擲地支持曾俊華，而反對這做法的所謂「原則派」（包括較激進左翼和年青的自決派），則被看成離地，未能順勢而行。少數的「原則派」在主流民主派支持者眼中，是不體恤民情，民眾要休養生息和厭倦抗爭。

曾俊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取得最廣泛的支持，從泛民到建制、由商家到普羅百姓。主流民主派期盼的完美境況，便是中央「習核心」作為開明嚴君，了解香港市民不是跟他作對，只是有一撮小人從中作梗。這些小人遭清除後，百姓黎民接納他認可的「賢吏」—— 曾俊華，然後大家攜手共建和諧社會。

越接近特首選舉日，越顯示出主流民主派上述的推論或期望，只是一廂情願、是一個錯判。中央在競選後期，已公開指示建制派，要全力支持林鄭月娥，而最終這亦成為歷史。

其實2014年大人的「8.31決定」和「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是先例。特首選舉只是又一次清楚告訴香港人，香港和中央並不存在互相尊重的理性關係，中央只會強勢執行自己的旨意，而且對港人的意見，越來越聽不入耳。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後，社會上浮現了所謂「和解論」。在林鄭月娥於選舉勝出後第二天，現屆政府開始大規模檢控佔中參與者。主流民主派領導人物可能真的出於好意，提出和解建議，希望新一屆政府上場後，特赦被檢控的佔中人士，以修補社會撕裂。主流民主派有人提出多方面特赦：包括已被定罪的「七警」、涉嫌毆打市民的警司朱經緯、同時也特赦已被定罪的社工曾健昭。

不過這個提議備受質疑，建制派認為這個做法是干預司法制度，而被檢控的曾健昭，亦不同意特赦，覺得這會變成政治交易，不能解決社會矛盾，最終倡議者亦承認思慮未週而撤回。

稍後，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約見各政團，包括主流民主政黨。會面沒有達成甚麼共識，雖然只是各自表述，但大家稱氣氛良好。其後林鄭月娥和曾俊華亦出席了公民黨的週年晚宴，大家亦言笑晏晏。有些傳媒更形容為「破冰」之舉。公民黨的解說是，以一個仍參與現實政治的政團，很難不與建制有接觸，而林鄭月娥仍未上任，對她的新班子，應予以疑中留情。之前對林鄭月娥的批評和恐懼，似乎已一掃而空。

回顧這近幾年來的政治現實，反對派無疑是處於一個困局。客觀上，「雨傘運動」的出現，是因為很多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到達一個爆發點，在既有的體制內不能解決。但就算是這樣一個歷史性的群眾運動，也未能撼動了甚麼。政治現實上，反對派現時面對一個龐大的敵人，實力對比絕對懸殊。反對派最後亦惟有走回既有的體制中去抗爭。

不過，主要反對派的領導要反躬自問，有否看到自己的局限？「雨傘運動」後反對派曾宣稱，在立法會的全面不合作。但這樣的行動，從未真正出現過。再回溯遠些，部分民主派所謂「又傾

又砌」、「和理非非」的抗爭策略，未能構成任何壓力。一些民主派議員，更對激進派的「拉布」、搗亂議會行為保持距離。有時就算參與了，也不敢光明磊落地承認。他們很擔心民眾未能理解行動背後的意義。

「雨傘運動」其間出現了群眾對領導的不信任，部分可能源自意氣之爭，但作為領導群眾的政治團體，究竟又顯示出有多大抗爭意志？很多時候，主流的反對派似乎更著重「策略考慮」，這樣是難以建立群眾長遠的向心力。若果領導立場飄忽，群眾自然會反問，之前的鬥爭是「開玩笑」的嗎？他們會問：如果「沒那麼邪惡」 lesser evil 可以接受，那麼「半桶水民主」 lesser democracy 也理應可以在「策略」上、「階段」上被接受？那麼「雨傘運動」是否只是一場鬧劇？早幾年大家就應和和諧地，接受那閹割的政改方案。

目前，形勢比人強和群眾意志消沉，是不爭的現實。但身為政黨領導，必須要顯示對理念的堅持，甚至有準備為理想而犧牲，並不應為短期得益而搖擺不定。運用謀略跟機會主義是不應混為一談。價值原則的混亂，只會更難維繫群眾的心。

曾俊華落選後退休逍遙去，但香港民主路仍遙遙無期。一個建制的人物，又豈會是民主抗爭的同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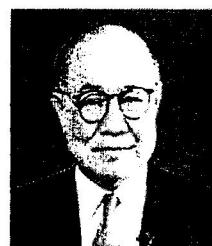
① 曾俊華

365 票



② 林鄭月娥

777 票



③ 胡國興

21 票

回歸二十周年 香港被一面倒地抨擊 涓滴

只過十七年 情況便大變

再過半個月，香港回歸就滿20年了。基本法總則第二條列明：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五條規定：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但在這20年內，香港走向高度自治之路是崎嶇曲折，波濤洶湧的。10年前許諾的2017年可實行雙普選，但今天仍沒有落實，而且遙遠無期。

而相反的，國務院在香港回歸17年，卻發佈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從而把基本法和《聯合聲明》所規定的中央人民政府只在港設立機構負責處理外交事務和管理香港防務的權力極多地擴大，把香港由明文規定享有的權力大大地削減了。（對於該白皮書，軍行曾有一文加以評論，刊於《十月評論》總236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嗣後也公開宣稱，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亦即收回基本法列明香港獲中央授權享有的管治權，肯定國務院上述白皮書的說法。

中宣部屬下的《時事播報》謬論

中宣部直屬事業單位出版的半年刊《時事播報》職教版，在最近發播了《香港回歸二十年：勿忘初心方得始終》的專論，該專論宣稱：「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一直是香港最大支持者，至少體現在八方面：一是政治上講信用，嚴格執行回歸時確定的“一國兩制”方針，將香港作為政治特區。」可是，筆者上述的把香港特區原定應享有的許多權力和權利剝奪去了，這完全不是「政治上守信用」的行為，而是不守信用的暴露。這也是「不守初心 不得始終」的自我譴責。

專論又一面倒地把香港描寫成毫無是處，一文不值，只靠內地支持、「恩賜」，例如說「五是旅遊上全民支持，中央政府一直大力鼓勵內地居民到香港去旅遊，而去香港旅遊的主要項目就是購物。」

不錯，內地同胞到香港旅遊，和港人到內地旅遊，都是相互得益，互惠互利的好事。而許多內地同胞港遊重要目的之一是購物，則是因為港貨價廉物美質佳，而「國貨」則遠比不上。

多年前曾因許多人來港是為了購物，洶湧前來搶購港貨，導致當局要限制每人來港次數。

專論又稱：「七是在民生上優先照顧，香港幾乎沒有農業，基本民生需求依賴內地，包括食品、水、電、氣的供應。」實際上，這也是互惠互利的商業性供應，不是免費贈送、施捨，儘管價格較外國的來貨

低廉及供應多，但是，例如香港每年購買東江水，仍要支付高達數十億元的水費代價的。

據民主黨司庫袁海文先生在6月9日《明報》《觀點》發表的文章指出，今日香港政府需向粵海投資每年繳付數十億元作供水(費)，2017年度的協議金額已上升至近48億元，佔粵海投資近半的總收入。

學者的中肯批駁

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先生，在《明報》4月26日發表了《回歸廿周年 中宣部幫倒忙？》一文，對該專論作了評析，質疑該專論是否恰如其份地反映香港的情況，為何對香港的國際地位和良好的司法制度隻字不提？呂先生文章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一直對內地投入大量資金、人才，對土地拍賣、金融監管制度、與國際接軌和司法改革更是功不可沒。」

「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資料：『香港是內地最大的直接外來投資來源地。截至2016年底，內地已經審批的外來投資專案中，44.7%和香港有關。來自香港的實際使用金額累計達9137億美元，占全國總額51.8%。香港也是內地對外直接投資的首要地點。中國統計數字顯示，截至2015年，內地在香港的直接投資累計達6569億美元，佔對外直接投資總額59.8%。』

「2016年，香港是內地第二大交易夥伴，僅次於美國。內地海關統計數字顯示，2016年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雙邊貿易總額達3046億美元。其中，內地對香港的出口貨值達2877億美元，令香港成為內地第二大出口市場。香港對國家這些貢獻，在紀念回歸廿周年之際又豈可一筆勾銷？」

呂先生跟著更引出如下一文以作比較：「10年前，香港回歸1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轄下的《中國經濟週刊》曾有一篇《學習香港好榜樣》的文章，一連提出香港8個優點供內地學習，以造福內地百姓。這種文章恐怕今天在內地已成絕響和禁忌。」

「文章結尾還說，香港值得內地學習的事情，遠遠不止8條，寄語在香港回歸廿周年之時，內地媒體可以做這樣的選題——『香港回歸N周年，帶來內地社會N方面進步』。」

「短短10年間，香港的優勢俱往矣，變成港獨臨城、一無是處，只能依靠『聖上恩賜』。以往和一直以來的貢獻怎麼都煙消雲散了？」

相差10年的評價竟如此不同，反證出中宣部的論述是顛倒黑白的。鑑於呂先生的評論非常中肯，有理有據，故值得筆者多加引證。

16/6/2017

天涯若比鄰 家寧

復活節 2017

陳中禧

彼此關心
用愛去對抗仇敵
我們的敵人是中共
故此 人人都要愛周遭的人
不要因小事而吵嘴
像水一般 無孔不入 滋潤世間
化成氣體 上青天
凝聚雲層變液體又臨人間
甚至固體的冰也能融化
奈我何乎
愛使敵 亂陣腳
最厲害 還是遺愛人間
先去愛身邊人
把戾氣化祥和是中國式
但使館人員探訪
打鑼打鼓去吹捧 造成風氣
只要風氣在
洗腦工序便失衝
只可惜 中國人的嘴巴說三道四多
讚美少
朋友
用放大鏡看優點
用擦紙膠擦去缺點
人便精神面貌都不同的
美便自然浮現出來
謝謝使館先生女士們探訪江天勇
已是成功的一半
自己都開心些
是嗎?
共勉之

當歷史揭盡見利忘義
搶奪終日
誰成為大阿哥?
坐右邊坐左邊
不擇手段
以為可成永恆的冠軍

訓誨淚乾
最後的晚餐以卑微作則
聖潔的手親洗踢人的腳
暗箭不敵坦言
明示賣義的代價將奪命

爭鬧聲中他們倦極甜睡
面對苦難之戰
祢禱告的汗珠如淚雨
賣義的人在陰暗出發
不法的審判釘死公義
十字架以卑微作則
洗腳的水以愛瀉地

祢以血寫新頁
滿足律法的要求
復活戰勝陰暗的火盆
罪惡與死亡再沒有年號

復活戰勝歷史的輪迴
重生了的生命
不再丟石頭
向愛與寬容
正義與犧牲出發

寫於16/4/2017復活節清晨

“佔中”行動與一國良制(轉載)

唐荊陵

《中國人權雙週刊》編者按：此文是作者在監獄中寫的。唐荊陵是著名的人權律師、《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長期致力於傳播和踐行非暴力理念，在中國宣導和推進公民不合作運動。多年來，他因維護人權，遭到當局監控、軟禁、強制旅遊、失蹤等迫害，妻子也受到牽連。2014年6月，唐荊陵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目前該案尚未開庭審理。我們發表此文，並呼籲海內外各界關注唐荊陵律師和他的家人。

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傳播和踐行非暴力理念，並在大陸宣導和推進公民不合作運動。這也正是我今天身陷囹圄的原因。在我尚未入獄時，久已密切關注當時尚在醞釀中的“佔中”行動。最近，看到新華社發佈消息稱“隨著銅鑼灣警方清場完成，持續八十天的佔中行動結束”。在看守所裡，資訊來源只有CCTV1和官方報紙，這讓我難以瞭解這場運動的真實景象和影響，但是盡可能深入分析這一卓越行動的價值，並加以弘揚，將是極有意義的，亦將有益於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國家的和平和繁榮。

這次“佔中”是一次相當成熟的非暴力抗爭運動，展現了香港泛民主人士的團結、勇氣、意志和行動能力。在早先爭取2012雙普選的目標遭遇挫折後，香港泛民主力量急需在運動目標、行動模式及時間表方面確立自己的方向和步調，並以此達成各方力量的廣泛合作。佔中行動的成功展開正是在這些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明顯標誌，堪稱香港民主化進程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佔中”行動期間，中共在宣傳上展開了持續的文宣攻勢。這從反面印證了“佔中”行動的巨大影響力。在看守所裡，我多次從CCTV和中共黨報上看到對“佔中”行動的負面宣傳，其只是報導官方的觀點，完全刻意回避對“佔中”行動的現場、

目標、各方交涉情況等新聞要素的客觀呈現。在CCTV許多有關節目中，無論是新聞還是專題述評，多是空空如也的畫面，偶有現場影像也只是一兩張靜態圖片；在國際關注方面，也只發佈過拒絕英國一個官方觀察團入境的外交聲明。儘管大陸媒介的宣傳十分扭曲，但“佔中”行動顯然徹底打破了當局的竭力封殺，讓民眾多少得知“佔中”的存在。

自回歸以來，尤其是近年隨著政治自由的萎縮，香港人民對赤化的恐懼從天邊的陰雲變成頭頂逐漸加大的風雨，各種社會運動逐漸蘇醒並趨活躍，如每年在元旦、“六四”、“七一”、“十一”都有大規模的集會遊行，顯示捍衛自由、追求民主的力量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這些集會示威行動——是各種社會運動的大雜燴式的展示，我稱之為百納被式的運動——很少集中於根本性的政治議題，而參加的人數往往達到了驚人的規模。但由於議題分散，或在議題上沒有形成共同目標，最終無以凝聚成改變既定模式下的政治慣性的力量。好比一列火車在錯誤的軌道上越走越遠，正逼近危險的深淵，乘客們即使紛紛醒覺、驚呼，若車長、司機和乘務員們置若罔聞的話，如不採取有效措施將火車變入正軌，顯然似是無法消除危險的。

佔中行動是一次凝聚進步力量的成功嘗試。以運動的持續時間、行動人數和地域規模，以及遵守非暴力行動紀律等方面來觀察，已經顯示了規劃保障能力、組織和合作能力、行動協調能力的高度水準。這些正是領導能力的重要指標。要領導一個社會——無論是國家還是城邦——成功實現民主化轉型，需要一支有相當規模且健全的民主力量，這些人應有堅定而清晰的民主理念，堅守理念的意志和道德勇氣，以及實現其理念的動員、組織和領導能力。這次行動是香港泛民主力量的一次成功演練。

我以為“佔中”行動更重要的意義是對整個大中華政治圈來說，因深刻暴露了一國兩制的危機，而凸顯了在這整個區域尋求一國良制的出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城邦，其百年來建基於英國習慣法之上的自由制度並沒有城邦自治憲章或非成文憲製作為制度保障。這讓香港的自由處於脆弱的狀態中。九七之前，英國的憲政制度及殖民地宗主權承擔了制度保障的角色。九七之後，由於中共廢除了過渡末期彭定康先生所主持的政制民主化方案，遂留下未經政治民主化的自由香港面對共產黨中央政府的局面。《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在某種程度上對香港的自由作出了承諾，但這種承諾是單向的，也不包含香港政治民主化的清晰時限（或按照一些觀點，認為上述協議可推斷出一個時間表，這正是當初雙普選行動所依據的一個理由，但這個觀點也被後來的釋法否定了）。至於中共政府本身則既不民主，也無自由，它自身治下的人民中追求自由的人要麼關在監獄，要麼流放海外，這樣的政府如何能成為自由的守夜人和保護者呢？它對自由的承諾又有什麼作為保證呢？

自由、平等、人權、公正等價值觀念若不能成為政治制度的靈魂，表現為對政府權力的明確限制，對基本自由的普遍信仰和法律保障，開放和公平的政治參與，則終將墮落為紙上的辭藻。

香港所經歷的一國兩制，一開始就不在勢均力敵的力量平衡中，但也不是處在最後一搏的決絕態勢之下，而是溫水煮青蛙的政治侵蝕。近年來，大陸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力量不斷上升，更加劇了兩制間的不平衡。從 1997 年到 2014 年不到 20 年間，已經經歷過的四十五條風波、司法終審權、基本法釋法權、反二十三條立法、居港權、雙普選、五區公投以及最近的媒體自律與媒體控制、反國教等重大事件，清晰地勾畫出一條專制的洪水不斷上漲的觸目驚心的警戒線。

這種一開始就沒有平衡點的一國兩制何以立足呢？一邊是懷著對西環治港的恐懼眼看自由日益喪失而逐漸奮起，意圖確立民主自治以維護自由的城邦人民，一邊是陷入管治和主權焦慮，

還加上盛世虛驕心態，力圖維持代理人政治的一黨專政中央，二者的合理交集何在呢？這是雙方已經各說各話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八個字能夠解決的嗎？

除開宗主國與殖民地的形態外，主權國家內的一國兩制的實踐大概惟有南北戰爭前的美國類似。在聯邦憲法的醞釀和誕生過程中，幾乎所有重要政治問題都展開了熱烈和深入的辯論，但奴隸制由於十分棘手而被刻意隱藏和回避。在獨立戰爭和制憲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維吉尼亞州就是一個蓄奴州。南北戰爭期間南方邦聯最重要的將領羅伯特•李也是一位“驕傲的維吉尼亞人”。自由的美國與奴隸制的美國之間在明爭暗鬥中維持著政治力量的均衡一直到林肯時代公開決裂和衝突為止。這是一段聯邦憲法所高舉的自由與部分州憲保存奴隸制之間尖銳衝突而自由最終得勝的歷史。林肯歷史性的論斷今天似在迴響：“分裂之家無以長存……這個國家不可能長久地容忍一半國土維持奴隸制，一半國土自由。”

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又能否維持千分之五的人民自由，千分之九百九十五的人民於共產專制中而相安無事呢？當然，這個比例是將事實過於簡化了。因為我們還有一部分在臨獄中的自由人民，一部分在流放中的自由人民，一部分在政治壓迫下而顛沛流離的自由人民。

佔中行動當然無法在大陸的 1982 年憲法中找到其合憲性淵源。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社會變革或轉型運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來源也不同。在有些社會形態下，合乎理性能承載人類正義追求的憲法能成為爭取自由或平等的抗爭人群實在法上的合法性源泉，但在有的地方，抗爭者必須基於正義、平等、自由等理念本身去尋求存在的合法性。這些價值才是法治精神的本質。在自由和正義被踐踏的地方，起而捍衛自由並欣然承受由此產生的代價和風險，才是維護或重建法治精神。自由或正義最危險的敵人正是未受到恰當控制的政府權力。由於文化傳統、風俗習慣或者民族相沿已久的性格等各種因素的差異，不同人群實際生活的制度環境和政府權力總是在魯濱遜的自由到完全非理性、虐待狂式的暴政兩個端點之間的某個位置上。當人們内心信奉的意

識形態與統治他們的制度沒有不可調和的衝突時，他們總是能接受、適應、甚至喜愛他們的制度，而不會輕易去改變它，即使這種統治在其他的人民看來是多麼低劣和難以容忍。但是，當一連串的交互行動表明在統治者和他的人民之間已經喪失了或根本不存在共同的意識形態，他們一方或彼此都放棄了各自相安無事的界限，衝突就不可避免，直至一方的消滅或屈服，或達至一個新的共同意志為止。

在佔中行動的醞釀期，發起者舉辦過多次研討，已經清晰地指出了佔中行動與香港部分法律的衝突。在我看來，這種分析和強調應更多視為對行動參加者的風險提示，而不是政治和法律上的價值判斷。大陸宣傳機構和官方人士如中央駐港聯絡辦主任張曉明、特首梁振英指稱“佔中行動損害了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傳統”，這即使不是顛倒黑白，至少是危言聳聽。回顧回歸十七年間的香港社會運動變遷史，從所關涉的議題，運動所採取的手段，當局的回應以及社會狀態的改變等來考察，不難發現，佔中行動正是香港人民在所珍視的自由和法治傳統日益淪喪，各種法律與制度救濟手段已經窮盡之後，而中共政府仍堅持維持小圈子選舉的情況下，為捍衛自由而採取的一個積極行動。

通往墮落深淵的軌道畢竟也是一種軌道。撥亂反正必然意味著某種原有秩序的終結。所以，不存在沒有任何衝突的社會變革，即令這種變革是由統治者本身發起和推動。正當的社會變革運動則在其手段與目的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適應性。作為一個經過長期的研討，從而使社會得以充分表達正反意見，而運動期間又保持有良好紀律的非暴力抗爭運動，佔中行動也符合這樣的評價標準。

至此已不難看到一國兩制的灰暗前景了，試圖以香港作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台海分治的歷史難題的樣板已成幻想。中共當局在香港民主化進程上的一味拖延和拒絕，以及對推動民主化進程的人士進行壓制，只會加速台島民眾與大陸心理距離的漂移，事實上成為分裂與對立的推手。最近十年來，維穩成為大陸的政治主旋律，統治危機日益深重。在藏區，最近三年內，近二百藏族各界人士焚身以殉，抗議中共的非人統治；在

新疆，則是不斷的暴力事件，並有延燒到漢族地區的核心區域之勢，中共在這些地方的統治幾乎快淪落為徹底的軍管。這一切都意味著與其在一國兩制的舊瓶上拼湊，不如回到一國良制的正軌上來。

中共雖自 1949 年暴力打敗了國民政府軍，與退守台澎的中華民國隔海分治，其憲法卻到 1982 年才大致穩定下來。作為其法統來源的 1949 年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則早在 1956 年反右時就被中共當局公開背棄和撕毀。儘管這先天不足的協定是在中共槍桿子之下的分果果式的會議上所達成，無論是在當時還是以後，這個共同綱領也從來沒有經過大陸人民任何形式的哪怕一次的認可——無論是通過公開廣泛的討論還是正式的投票——這樣掩掩藏藏的法統在今天的世界上還能走多遠呢？

因此，爭民主以捍衛自由不僅是香港同胞的緊迫需要，也是大陸的出路所在。只有一個可被廣泛接受的憲政解決方案，吸納各族各地人民的同意，才能建立長久自由、繁榮和幸福的根基。早在 2008 年，一批海內外有識之士攜手發佈了《零八憲章》，正是一次勇敢的嘗試。這次行動雖因憲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劉曉波先生的入獄而遭遇殘酷壓制，卻在今天更顯出了我們簽署者們的遠見。香港、大陸乃至臺灣對岸的各種進步力量在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幟下正漸漸交織成一道多彩的飛虹，它將跨出風雨後的陰霾，映照這片幅員遼闊的大地豐美的未來。

2014 年於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轉載自《中國人權雙週刊》第 148 期 2015 年 1 月 9 日—2015 年 1 月 22 日)

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病危的劉曉波！

軍行

劉曉波在8年冤獄中受盡苦難折磨，終於患上肝癌至晚期獲准保外就醫，在他病重垂危後才向外宣布，令大眾憂心忡忡。據資深醫生估計，如服標靶藥，可延壽半年。

據今年6月27日《明報》總結劉曉波的大事稱：劉曉波在1989年參加學運靜坐絕食3日，與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商議後，說服數以千計的學生安全撤離。91年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因勸服學生撤退有功，免於服刑。1996年以「擾亂社會秩序」罪被處勞教3年，同年與劉霞結婚，勞教期滿後，在北京從事寫作。2008年發起和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被刑事拘留，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監11年，在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還只是他行使公民應有的言論和發表的自由權利，無辜被判服此較長期冤獄，以致生命難保。2010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這顯示劉曉波已獲得國內外人士的廣泛同情和支持。

既然劉曉波本來就不應被以言論入罪服刑，後來更遭黑獄折磨而引致病危，瀕臨死亡，那就不應只准「保外就醫」，而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讓他自行延醫救治。這是刻不容緩的要事，否則，當局就需負上有意謀殺的千古罪人惡名！

實際上，劉霞曾要求院方給予檢查曉波的病情報告，但遭拒，有如隱瞞真相，劉霞又曾多次要求讓曉波出國醫治，也被拒絕。直到他病情惡化已不能施手術進行電療、化療，才將他送入醫院醫治，這時已病到末期，照國內醫術醫藥實況是難以醫好他的，但又不許他出國醫治。這許多表現顯示當局是有意謀殺劉曉波。

對於中國官僚這種殘暴專橫，已激起國內外普遍的公憤，紛紛聯署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劉曉波，讓他出國醫治。這些強大壓力最後能否使中國共產黨及政府讓步，就有待於各方面壓力的加強發展了！

2017.6.29



當局須即釋放無辜被囚律師和異見人士！

劉山青輯撰

濫捕、刑訊、囚禁或限制人身自由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報導：“截止2015年7月13日8時，共涉及107人，被刑拘、監視居住7人、被失蹤、帶走、失聯絡的15人、被短暫拘留、約談、傳喚後獲准回家的共85人；截至2015年7月14日11:00，共計146名律師／律所人員／維權人士被刑拘／帶走／失聯／約談／傳喚短期限制人身自由。”

根據《維權網》所整理的資料，2015年7月11日有18名律師被警方強行帶走，包括北京王宇律師、北京周世鋒律師、北京李姝雲律師、北京李和平律師、廣西覃永沛律師、廣東隋牧青律師、北京劉曉原律師，河南常伯陽律師、甘肅李大偉律師、河北李威達律師、廣西南寧覃永沛律師、湖南謝陽律師、胡林政律師 河北李威達律師、北京王全章律師、北京黃力群律師、上海秦雷律師、湖南羅茜律師。

內地官方傳媒也高調報導：從7月10日週五開始，在兩天內共涉及81人，其中6人遭刑事拘留、1人遭監視居住、28人遭扣押未獲釋、46人獲准回家。事件涉及多達23個省份。

2017年3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附件二中的第8個個案介紹了當中被判刑的「周世鋒、胡石根、翟岩民等顛覆國家政權案」。

觸發點

2015年5月，一名討飯者(或賣藝)徐純合，在黑龍江慶安火車站候車室被警察開槍擊斃。事件引起20多名前往聲援的公民和提供法律援助的維權律師，先後被警方拘留。維權律師發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聯署聲明，並獲得660名律師簽名支持。

另一邊廂，四名律師在江西高院前，抗議法院剝奪「樂平冤案」律師的閱卷權，參與抗議行動的維權人士吳淦(屠夫)，涉嫌「尋釁滋事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

最新發展

截至2017年5月31日，當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1人、羈押待審的4人、一審審結的9人、取保候審的15人、解除取保候審的12人、撤銷指控的1人、限制出境的41人、曾被短暫拘留／強制約談／傳喚(已獲釋)的264人。當中：

江天勇律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6個月，已屆滿。

一審審結：

胡石根，判刑七年半；

周世鋒律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李和平律師，判刑三年，緩刑四年；

劉星，判刑2年，2017年5月26日刑滿獲釋；

尹旭安，判刑3年6個月；

姚建清，判刑2年，2017年6月4日刑滿；

張婉荷，判刑1年8個月，2016年1月3日刑滿獲釋；

翟岩民，判刑3年、緩刑4年；

勾洪國，徒刑3年，緩刑3年。

羈押待審為王全璋(至今音訊全無)、吳淦(又名屠夫)、李燕軍、王芳(2017年3月30日審訊，上級法院批准延期3個月審理)。

三所律師行

709涉及三個內地的律師行被抄家，分別為“鋒銳律師事務所”、“李金星律師辦公室(NGO的洗冤行動辦公室)”，及“李和平律師在北京的辦公室”。

“鋒銳律師事務所”

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成立於二零零七年四月，是北京知名律師事務所。全盛期有執業律師、實習律師、行輔人員一百多人。律師大多由畢業

於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名牌院校的具有博士、碩士、雙學士學位的專業律師組成。主要業務為刑事訴訟業務、房地產與建築工程，上市公司業務等。

經北京市司法局，四川省司法廳批准，北京鋒銳(南充)律師事務所於2013年11月18日正式成立。

當中的維權律師周世鋒、王宇、劉曉原、王全璋等曾代理訪民、弱勢族群、法輪功無罪辯護案件而得罪當局。

2015年7月10日起，北京當局公安部抓捕維權律師及人士，其中位於北京的鋒銳律師事務所是成為一個摧毀的重點目標，有多人遭到抓捕。

“李金星律師辦公室”

2011年7月22日，李金星在辦理北海案“裴金德等涉嫌故意傷害罪案”辯護期間遭受暴徒圍攻毆打住院，全國律協發出聲明聲援。

“李金星律師辦公室”另一場觸怒權貴的官司是為楊茂東、孫德勝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一案辯護。

2014年6月19日，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檢察院向天河法院提起公訴，指控楊茂東、孫德勝等人在2014年1月份聲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以及孫德勝等人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要求全國人大簽署《公民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

李金星律師被指於去年在廣州天河法院上庭的時候，擅自發言、打斷法官發言，干擾訴訟，面臨停止執業一年的處罰，引來超過三百二十業界聯署聲援。

“李和平律師辦公室”

北京律師李和平在去年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於今年4月28宣判，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判決書指出，李和平在2008年以來，多次通過互聯網或借境外媒體採訪，抹黑、攻擊國家政權機關和法律制度；利用境外資金炒作熱點案件，挑起人民對社會制度不滿；勾結一些宗教活動人員、職業訪民、律師等策劃顛覆國家政權。

官方報導

《習近平關於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

中共官方媒體值該書出版機會發表文章表示『決不能讓不鬧不解決現象蔓延』。

多維新聞2015-05-14

近日，《習近平關於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一書正式出版。據悉，該書摘選自習近平講話、報告、批示、指示等30多篇重要文獻。其中，該書第六篇重點論述增強全民法治觀念，使遵法守法成為全體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覺行動。此外，書中還特別強調，“決不能讓那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現象蔓延開來。”

“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權力領域，就會帶來問題，甚至帶來嚴重問題。”陸媒《人民網》在報道中提到，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一系列講話中闡述了嚴格依法行政的重要性，指出

“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人們的社會聯系廣泛，上下級、親戚朋友、老戰友、老同事、老同學關係比較融洽，逢事喜歡講個熟門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權力領域，就會帶來問題，甚至帶來嚴重問題。”習近平說：“引導群眾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逐步改變社會上那種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現象。”他還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誰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報道援引了2013年2月23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要引導全體人民遵守法律，有問題依靠法律來解決，決不能讓那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現象蔓延開來，否則還有什麼法治可言呢？要堅決改變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現象，誰違法就要付出比守法更大的代價，甚至是幾倍、十幾倍、幾十倍的代價。當然，這是一個過程，要逐步在廣大幹部群眾中樹立法律的權威，使大家都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訴求，通過法律程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結果。”習近平說。

環球時報

2015-07-12

社評：少數“死磕派”律師栽跟頭是必然的

中國公安部指揮摧毀了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中心滋事擾序的“重大犯罪團夥”。根據官方媒體報導，一些常被稱為“死磕派”的

“維權律師”與一些推手、“訪民”相互勾連，製造了包括慶安事件在內的一系列大規模輿論事件，嚴重擾亂了具體案件的依法處理。昨晚公開的一篇長文披露了很多讓人驚訝的細節。

“死磕派”律師是近年社交網站興起後的突出現象。律師的“死磕”精神本身包含有積極意義，與依法治國有一定相向關係。然而極少數熱衷“死磕”的律師並非以法庭為舞臺，而是把精力投向輿論場，用輿論壓力推動案件的處理方向，甚至組織現場抗議活動，加大壓力的籌碼。

從公安部公佈的有關案情看，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涉案律師在“死磕”路上走得過遠。比如他們勾連推手操縱圍繞慶安事件的互聯網輿論，嚴重誤導了公眾的看法，將一個事實清楚的案件生生搞成“強烈要求真相”的全國性輿論事件，撕裂了社會，刺激了一些不明真相者對政府的不滿。……

《人民日報》

北京鋒銳律所案追蹤

新華社記者 鄒偉 本報記者 黃慶暢

(2015年07月19日 04版)

“我認罪，希望能給我一個機會。”

近日，公安部指揮多地公安機關摧毀一個以北京市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臺，少數律師、推手、“訪民”相互勾連、滋事擾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團夥，周世鋒、王宇、李和平、謝燕益、隋牧青、黃力群、謝遠東、謝陽、劉建軍9名律師和劉四新、吳淦、翟岩民等人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民網評》

5月29日《民網評》的「超級低俗屠夫 被刑拘為誰敲響警鐘」表示：「在不少人眼裡，吳淦威風八面——似乎越來越有「號召力」——「吳淦們」明白事情的嚴重性質，算盡機關太聰明，到頭必定是法律的嚴懲。」可見，維權運動中受到針對的除了律師以外，還有一大批來自基層的推手。他們善用「互聯網傳播資訊快，傳播的成

本極低」，「向其他激烈的線民傳授經驗」，而且十分有技巧。

在6月，翟岩民、劉建軍和「留著大鬍子、長頭髮紮辮子」的著名推手劉星等人也被指有酬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刑事拘留，及被官媒高調報導。

央視

CCTV在2015年5月25日上午的《朝聞天下》欄目播放一段長達近六分鐘的《網名「超級低俗屠夫」被拘真相》節目。

《人民日報》

揭開「維權」事件的黑幕

《人民日報》在第一時間，在7月12日第2版以4,600字，以上為題的文章將事件說得很白。文章指出，「黑龍江慶安、江西南昌、山東濰坊、河南鄭州、湖南長沙、湖北武漢……一系列熱點事件的現場，為何屢屢出現律師挑頭鬧事、眾多『訪民』舉牌滋事？」

「經北京、天津、黑龍江、山東、福建等多地公安機關縝密偵查，日前，備受關注的翟岩民、吳淦等人涉嫌嚴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進展——北京等地公安機關集中行動，摧毀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臺，自2012年7月以來先後組織策劃炒作40餘起敏感案事件、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團夥。至此，一個由『維權』律師、推手、『訪民』相互勾連，組織嚴密、人數眾多、分工精細的涉嫌犯罪團夥浮出水面，其以『維權』『正義』『公益』為名、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之實。」

基層推手

在維權運動中，一群基層推手是重要的一個組成。他們並非律師，但他們接觸到社會的底層，看到社會的不公。這些推手對共產黨的手法有深刻認識，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也對共產黨完全沒有幻想。他們“膽大”、“立場鮮明”，善用互聯網絡成了頗具影響的“意見領袖”。他們在看到機會時，出手很猛。這批推手有長久的抗爭經驗，與基層的重要力量(如上訪運動，法輪功)結

合，與維權律師結合，所以共產黨十分痛恨他們。我們可以在人民日報的長文“揭開超級低俗屠夫真面目”看到一二。在這批基層戰士中，吳淦原是一名小兵，翟岩民是一位小商人。捕捉吳淦實質上是709事件的起點。

特別值得注意的個案

樂平冤案

「樂平冤案」指的是2000年樂平中店村發生一起搶劫、強姦、碎屍案，當地超市一老闆及一女子遇害。五名村民被認定為兇手及重判入獄。2013年，在另一宗案件中，兇手承認「樂平案」是他所為，但法院不肯翻案，維權律師為了爭取閱卷權，長守法院外靜坐18天。吳淦只是一個聲援角色。

吳淦「從外地趕到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大門口高聲辱罵該院負責人。19日上午9時許，吳淦再次來到法院門口，繼續高聲辱罵該院負責人，並擺放事先製作好的帶有侮辱性質的看板，準備在法院門口擺設靈堂。」於是，「南昌市公安局以“擾亂單位秩序、公然侮辱他人”為由，把吳淦分別決定行政拘留五日、合併執行行政拘留十日處罰。」

「慶安槍擊案」

2015年5月2日，黑龍江慶安縣一名討飯者徐純合帶著82歲的母親和三個6至4歲兒女原本準備去往大連，車站安檢人員認識他們，以為他們又要赴外地上訪。在爭執中，火車站民警在100名旅客群眾，60多名現場目擊證人和他的母親及小孩前槍殺了他，轟動全國，不僅引爆各界輿論怒火，也引發慶安官場「塌方」及當地一系列貪腐案件被持續曝光。

短短3天，超過660名中國律師聯署簽名，抗議慶安當局抓捕聲援律師的非法行為。

禍延家人

中共在709事件中的處理手法之一是禍延家人。其中的例子有拘捕吳淦父親，指其犯上經濟罪；王全璋的父母遭不明人員逼遷，被斷水斷電。

迫服藥物

維權人士劉星出獄時表示，服刑期間曾被迫服用所謂的“降壓藥”；李和平律師在押期間遭強迫服藥和戴“工字鏈”酷刑；維權女律師李姝雲揭露政法系酷刑披露被迫服藥；李春富律師被強迫服藥；勾洪國透過妻子披露在被羈押期間遭強迫用藥的細節。

結語

習近平今次的瘋狂拘捕維權人士，跡近鄧小平在25年前的全國打壓民刊運動。一九七九年，爭民主、爭人權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波及全國。鄧小平利用這一運動上位。當魏京生警惕國人他假民主，真獨裁後，鄧在全國拘捕出版民主刊物人士，多人被重判10年至14年監禁。同樣地，習近平的中國夢觸動很多社會利益，如官搶民地和化工污染項目等。習近平一方面反貪腐，強調法治，在另一方面又不能容忍維權活動揭露社會的黑暗面。

正如民主牆事件是鄧小平的假民主與真民主之爭，今天的「709大抓捕事件」是習近平時代的真法治與假法治的決戰。

當局必須立即釋放所有被無辜拘留迫害的維權律師及其他人士，嚴禁在拘留時的刑訊逼供，在拘捕後監獄中的酷刑折磨，停止對被監視人士的迫害，恢復他們的人身、居住等自由。

致所有關注709案及吳淦的朋友的公開信(轉載)

徐孝順(吳淦父親)

各位同仁，吳淦的兄弟朋友們，709案的各位受難者和聲援者，我在這裡向大家問好。我叫徐孝順，是吳淦的父親，我比這個政權早幾個月來的到中國。自吳淦被當局非法關押以來，各位對他給予的支持和關注，我借此機會表示衷心感謝。謝謝大家！

吳淦隨母姓，卻沒有繼承他母親的溫和，脾氣和我一模一樣，喜歡打抱不平。多年以來，吳淦幫助過很多素昧平生的人維權。我不像他那樣懂得上網，只能看到身邊的人和事憑經驗折騰一下，他怎麼折騰，具體的情況我瞭解不多。我所能瞭解和信任的，是他的滿腔熱情和正直善良。我也曾經說過他，你這樣不疼不癢的折騰有什麼用，遲早把自己搞進去。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們每次見面都要爭執，但是每次爭執之後，我們還是會去各自折騰。

2008年以來這幾年間，吳淦所做的事情相信大家都略有所知。當局非常痛恨他，也曾經多次打壓他，但都沒能讓他屈服。它們做事的風格就是那樣，治不了本人就找家屬來要脅。於是在2012年9月13日，本地政府糾集了一些人，編造理由，以職務侵佔罪把我刑事拘留。報案人福清市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本身不具備經營汽油的資質，他們經營走私汽油，沒有經營重油項目，卻串通公安局捏造假案，誣告本人倒賣50.9噸重油，侵佔重油貨款。所以關押到2013年5月23日，該案經兩次補充偵查後，卻不依刑事訴訟法171條規定作出不起訴決定，只讓我取保候審。取保一年到期(2014年5月23日)沒有證據才解除取保候審。但是在2015年5月19日，吳淦在南昌江西高院為江西樂平一起死刑冤案維權時，又被抓並關押起來。為使吳淦屈服，它們又開始折騰我。我自問沒有做過任何傷天害理的事情，它們就用之前編造的事由，於2015年6月25日又把我刑事拘留。此後，它們裝模作樣地開了三次庭，2017年1月19日又讓我取保候審。同年4月17日，福清法院才作出了允許檢察院撤訴的刑事裁定書。2017年5月3日，我收到了福清市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書。從刑拘到撤訴，我這次被關押了近2年。至此本案從開始至結案跨越6年，我本人生活也遭受6年迫害。

明眼人都能看出，前後我被關押兩年多，是因為我兒子吳淦的維權活動。我受了些苦，但是我從來沒有怪過他。他做的事情沒有錯。我也算個有些文化的人，這中間的道理我懂。有人說我是被連坐，對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連坐是商鞅發明的，指一個人犯罪，親人有責任要被罰。我兒子吳淦並沒有犯罪，我被抓，

只是被當作要脅吳淦認罪的人質罷了。這種說法，相信大家更容易理解。本來現在吳淦還未“審判”，709同難者很多還在被當局非法關押，還不到向大家說聲感謝的時候。我身體不太好，看守所裡面被關了兩年多，老毛病發作，腰腿不是很利索。現在我自己的“案子”了結了，我必須要出來說一聲，謝謝大家！謝謝大家兩年多來對我的支持，對吳淦的幫助。我想，這也是我們709同案家屬的心聲。

我仔細看了它們炮製的對吳淦的“起訴書”。按照“起訴書”列舉的，我兒子吳淦涉及十二件事情：聲援福建三網友，聲援拆遷，聲援我，聲援建三江，聲援懷化黃氏姐妹，聲援鄭州十君子，聲援程海律師，聲援雲南陸勇，聲援範木根，聲援慶安徐純和，聲援江西樂平案。這十二個案件，每一件都有具體的受難者，都是確實存在的問題甚至罪惡。聲援受難者，為受難者伸冤，卻得到“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說實話，看了起訴書，我很生氣。吳淦不就是打抱不平，還沒有到梁山聚義，卻撈了個反賊的名號。對於他的做法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的內心真是為他感到驕傲。我可能並不完全理解我的兒子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是我瞭解我現在生活的這個社會和統治它的這個政權。

我出來以後，吳淦的朋友給我找來他之前自己錄的一個視頻，看完視頻，我哭了。這麼一把年紀，我很少哭的。1999年，村裡被污染，我牽頭維權被判刑關押時，我也沒有哭。但是看完兒子的視頻，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我哭了。我兒子是條漢子，我卻哭的像個孩子。

我不會上網，但朋友們給我看了網上的消息，知道了不少吳淦被抓後發生的事情。我知道吳淦被抓後，還有很多律師被抓，這個大案子叫做709案件。很多709家屬及親友都在一起奔波呼籲，特別是王峭嶺女士和李文足女士，她們特別了不起。還有很多支持709同難者的親友和網友，你們都特別勇敢，充滿智慧。作為吳淦的父親，作為709家屬的一員，雖然腰腿不便，但我也想加入，儘量做一些事情。

吳淦被抓前，交代了讓一些朋友幫忙料理，拿主意。他們會上網，資訊多、動作快，人多力量大，我也很放心。我寫這封信，既是要表示感謝，也想通過這個途徑發出呼籲：大家一起來，為了709案件，為了我兒子吳淦，反賊不嫌人多。

簡評國務院的工作報告

張開

中國並非社會主義社會

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作的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繼續重彈長期以來的老調：「我們堅信，有黨的堅強領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國發展一定能夠創造新的輝煌。」「把握好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

但實際上，從鄧小平提出並實行改革開放路線以後，中國便走向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道路，隨著中國經濟蓬勃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更蓬勃發展起來，越來越佔有優勢，筆者曾引2016年3月12日《文匯報》轉載同月11日的《南方日報》評論文章指出：目前中國非公有制經濟數量已占市場總數的90%以上，並創造了超過60%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0%的社會就業，超過65%的固定資產投資，超過67%的對外直接投資（詳見本刊總240期拙文）。這些都表明：公有制經濟已不再是中國經濟的主要部份，即中共所稱的「主體」部份，以前稱的主要部份已經被非公有制經濟所取代了！

社會主義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中國現時並不是主要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而主要是以非公有制的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在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可實行人人有工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在高級階段，才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中國直至今天，都遠未能做到這些，《報告》承認，2016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4.02%，為多年來最低，去年實現了超過80%的社會就業，亦即還有20%不到的失業者。農村貧困人口在2015年官方數字還有7千萬，2016年減少1240萬，最快要到2020年才能完成「全部脫貧」

的目標。《公報》指稱在脫貧工作中還出現了「假脫貧」，「被脫貧」，數字脫貧等虛報弊病。這使官方的脫貧數字可能含有水份。這些重要事實都顯示：中國至今仍不是馬克思主義所稱的社會主義社會。



非公有制經濟勢必更佔優勢

《報告》提出的今後推行政策，更會助長非公有制經濟的大步發展，十分具體明確全面，呵護備至地作出如下宣示：要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深入落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加快構建新型政商關係。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即鼓勵前者侵併後者——引者）。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進一步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凡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允許各類市場主

體平等進入；凡向外資開放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向民間資本開放；凡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不合理行為，都要堅決制止。

「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要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障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激勵人們創業創新創富，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使企業家安心經營、放心投資。對於侵害企業產權的行為，必須嚴肅查處、有錯必糾。」

《報告》又在回顧2016年政府工作的成就時指稱：工業企業利潤由上年下降2.3%轉為增長8.5%，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5%，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明顯提高。同時，全年降低企業稅負5700多億元，所有行業實現稅負只減不增。

所有這些利潤增長和減輕稅負，自然包括非國有企業在內，全都得到利潤增長和稅負減輕的好處。



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

但在《報告》盡述政府工作的「豐功偉績」時仍然宣稱：「我們也清醒看到，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仍需增強，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嚴重，一些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較多，地區經濟走勢分化，財政收支矛盾較大，經濟金融風險隱患不容忽視。環境污染形勢依然嚴峻，特別是一些地區嚴重霧霾頻發，治理措施需要進一步加強。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食品藥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人民群眾還有不少不滿意的地方。煤礦、建築、交通等領域發生了一些重大安全事故，令人心痛。政府

工作存在不足，有些改革舉措和政策落實不到位，涉企收費多、群眾辦事難等問題仍較突出，行政執法中存在不規範不公正不文明現象，少數幹部懶政怠政、推諉扯皮、一些領域腐敗問題時有發生。」

當然，以上的陳述有些是輕描淡寫，說是「一些」、「有些」，而且是不完全的。特別是重大的問題，例如官僚專政，官員專橫腐敗，幾乎無官不貪等，都沒有提到。

《報告》提及中國現時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過去一年，我國發展面臨國內外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交匯的嚴峻挑戰。」

「我們面對的是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速7年來最低、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地區和全球性挑戰突發多發的外部環境，面對的是改革進入攻堅期、利益關係深刻調整、影響社會穩定因素增多的複雜局面。」

這種複雜困局主要是中共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造成的。中國對外國越來越開放，關係更加密切，受外部影響更為直接；對內則私有財產更蓬勃發展，階級分化，貧富日益懸殊，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官僚專政與人民之間的對立和鬥爭更加激烈，這也是《報告》所稱的「影響社會穩定因素增多的複雜局面。」

為了歌頌習近平主席的偉大正確領導，《報告》有將近10次提到他的名字，極盡個人崇拜吹捧的能事！但對於上述困局的造成及加深，他也應負相關的責任的！

15/04/2017



後患無窮：中國化工天價收購先正達 青岩

根據新華社2017年6月28日報導，中國化工集團公司（ChemChina）在瑞士巴塞爾宣佈，完成對瑞士農業化學和種子公司先正達（Syngenta）的收購。中國化工以430億美元收購先正達，創下中企海外單筆收購金額最高紀錄。新當選的先正達董事會主席、中國化工董事長任建新表示，這次收購體現了雙方在糧食安全問題上的理解和洞見有著高度一致性。

目前亞太市場只佔先正達營收的15%左右，先正達在亞太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未來將逐步釋放。任建新說，先正達進入中國非常好的基礎，中國化工將提供現有資源，幫助先正達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中國的發展。收購之後，先正達運營、管理層及員工的完整性得以保持，總部及主要生產和研發機構仍保留在瑞士巴塞爾。任建新說，先正達強大的創新能力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將帶動中國國有企業的結構調整和改革發展。

作為分別在瑞士和美國上市的全球第一大植保公司、第三大種子公司，先正達在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兩萬多名員工。截至2016年底，先正達總資產1334.2億元人民幣，當年銷售收入895.3億元人民幣，淨利潤84億元人民幣。

民間反對浪潮

根據人民食物主權論壇，秦仲達(原化工部部長，93歲)因先正達面臨美國數萬農民和國際糧商130億美元巨額賠償訴訟，率3068志願者第四次緊急上書中央要求制止並購，現繼續廣泛徵求全國各地更多連署簽名。

2017年3月10日，美國加州法官判決：支持加州環保部將草甘膦列入致癌、致畸形或其他生殖危害毒性化學品清單的訴求，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劑農達須標識“可能的致癌物”！這是自2015年草甘膦除草劑被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所列為“對人可能的致癌物”後，又被美國一個州政府規定為必須標注的“可能的致癌物”，並得到法院判決的認定。從而使草甘膦除草劑“農達”在其出產地——美國必須標注為“可能的致癌物”已成為法律。目前美國已有近千起草甘膦除草劑致

非霍金森淋巴瘤訴訟起訴孟山都，並且這個數字還在快速增長。

中國農業部至今仍在其官網宣傳草甘膦“毒性比食鹽還要低，在動物體內不蓄積，未見致畸、致突變、致癌作用”形成鮮明的對照。並且農業部至今仍在以涉及商業秘密為名，拒不公開民眾申請公開的草甘膦農達、百草枯、麥草畏、莠去津、拿捕淨，這些除草劑的毒理學安全性動物試驗報告。

轉基因農化巨頭孟山都將因其轉基因種子及其伴侶（草甘膦除草劑農達）對人類健康的危害而面臨海量的訴訟和巨額賠償而面臨破產倒閉厄運。在先正達連年銷售大滑坡瀕臨倒閉之際，中國化工卻報價430億美元（約3000億人民幣）整體並購，比簽約當天收盤價溢價約20%；且先正達公司原有機構人員和業務還保持不變。以至於先正達公司董事長蜜雪兒-德馬雷（Michel Demak）激動地說這是“夢幻般的交易”。

先正達巨額賠償後患

根據楊曉陸(獨立學者)信息，2017年6月24日，美國堪薩斯州一個陪審團判決，瑞士農化巨頭先正達須向該州農民支付2.177億美元賠款。該公司將一款轉基因玉米種子MIR162在未獲得中國批准的情況下率先引入美國市場，結果導致該州農民因這種玉米無法出口到中國而遭受巨額損失。

此案的原告是堪薩斯州四位農民，他們代表該州超過7000個玉米種植戶。先正達在2011年就向農民推銷其轉基因種子MIR162，聲稱中國將於當年批准對這一玉米品種的進口。在未獲批准的情況下，糧食出口商仍然偷運此種轉基因玉米非法入境中國，直到2013年中國才禁止該種非法轉基因玉米入境。農民控訴先正達罔顧農民生計，拿轉基因種子忽悠，造成玉米價格連續幾年下跌。這一訴訟只是先正達背負巨額賠償的開始，還有來自美國20多個州的35萬玉米種植戶高達130億的損失賠償要求正等待進入庭審程式。

楊曉陸指出，原總部設在瑞士的先正達是世界第三大轉基因種子公司，因推出第一代轉基因

作物而臭名昭著。先正達正積極開發下一代轉基因作物，例如轉基因大豆SYHT0H2、轉基因大豆RR2 Yield-SCN、轉基因玉米Agrisure VipteraG (MIR162)與“黃金大米”，這將對中國糧食作物造成廣泛而無法控制的污染，對中國消費者的健康與食品安全以及中國農民的生計造成嚴重危害。

先正達還是阿特拉津(莠去津)、百草枯(克無蹤)、麥草畏等世界某些高危險性農藥的發明方和主要製造商。除草劑阿特拉津(莠去津)是“內分泌干擾劑”，可以損害生殖系統並增加癌症的風險，對人類健康與生態系統危害巨大，因此2005年已被歐盟禁止。

中國目前已有600多個含莠去津(阿特拉津)除草劑產品獲得“農藥登記”。百草枯(Paraquat)是另外一種高危險農藥，被先正達以“克無蹤”

(Gramoxone)名稱在全球銷售，是世界最廣泛使用的一種除草劑；因為它有積累性的危害，包括眼睛損傷、皮膚灼燒、刺激、甚至死亡等，36個國家已經禁止百草枯。

先正達這些高危農藥儘管早已在中國大量銷售使用，卻至今仍以“商業秘密”為由，拒不公開其毒理學動物實驗報告。



中國核電計劃不可取 破謎

根據核電縱橫，2017年5月21日，瑞士選民第八次就核能議題進行全國投票。最終，以推廣可再生能源、禁止新建核電站、降低能源消耗為綱要的《能源戰略2050》以8.2個百分點的優勢(贊成58.2%，反對41.8%)獲得了通過，瑞士能源就此正式進入轉軌期。該法案將從2018年1月1日起生效，瑞士將不再新建核電站，並在未來徹底退出使用核能。該法案還確定了瑞士將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推進能源轉型。

2017年6月19日，文在寅在南部港口城市釜山出席韓國首座商業運營核反應爐“古里1號”退役儀式時說：“我們將摒棄以核能為中心的能源政策，邁向一個無核時代。我們將徹底廢止所有正在進行中的核反應爐建設計畫。”

文在寅還表示，西方發達國家減少核電站，宣佈脫離核電，但韓國卻背道而馳，成為核電站最為密集的國家，若發生事故，其後果不堪設想。新政府將確保核電站安全視為決定國家存亡的重要安全問題加以對待，將核電安全委員會升格為總統直屬機構。

文在寅還表示，新政府將開啟脫核電和未來能源時代，扶持新再生能源、LNG發電、太陽能、海洋風力發電等清潔安全能源產業。將能源產業與第四次工業革命掛鉤，將其發展成為韓國的新增長動力。重整環保能源稅制，改變能源高消費產業結構，整改工業用電費系統，防止工業部門過度消耗電力。拆除核電站是耗時久、耗資大、需要尖端科技的高難度作業，為此將在東南部地區新設有關研究所確保技術，積極提供支援。文在寅先前公佈一個目標：爭取到2030年實現韓國20%的電力來自清潔可再生能源。“規劃建設無

核、無煤國家的同時，政府也將制定一整套利於環保的能源政策。我們會遇到很多困難，但這是一條必經之路。”

其實，永久關閉“古裡1號”即古裡核電站1號機組是朴槿惠政府2015年就定下來的事。這台機組1978年開始投入商業運營，設計壽命30年，2007年修整後獲批准延期至2017年再退役。運營商韓國水電與核電公司(KHNP)原打算再次申請延期運行到2027年，2011年日本福島核洩漏事故發生後，這座韓國最古老的核電機組安全狀況備受關注。KHNP後來放棄延期申請。

文在寅的政策絕對逆流而上。韓國上世紀70年代建成第一台商業核電機組，進入21世紀以來更積極推進自主研發核電技術，爭奪海外市場訂單，躋身核技術主要出口國行列。韓國國內核能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30%左右，規模在世界居第五位元。

2009年，韓國打敗了法國核電集團阿海琺(Areva)、美國通用(GE)兩大老牌核電出口公司，成功拿下了阿聯酋價值400億美元的核電站建設、提供燃料及後期運營、維護和的協議。標誌著韓國成功躋身於繼美國、法國等國家之後的世界第六大核電出口國。到2030年，將出口80座核電機組，價值超過4000億美元。2011年發生在日本的福島核電事故，沒有讓與日本只隔一個朝鮮海峽的韓國對核電望而卻步。在2011年年中，韓國政府重申發展核電的原計劃不變。當年年末，時任韓國知識經濟部部長洪錫禹表示，韓國的核能政策沒有改變，仍將興建核電站。

清華一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員、核安全問題專家趙通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趙通認為，文在寅政府決定給核電發展降溫，反映了國際趨勢：隨著天然氣價格下降和可再生清潔能源技術的發展，核電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競爭力下降。核

電成本居高不下，使全球一些大型核電企業普遍面臨經營挑戰。

可惜，中國不只在國內興建核電站，而且雄心勃勃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核電計劃。據德國之聲電臺網站6月5日報導，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與此同時也在大幅擴建核能。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中國電能的約四分之一，核能占3.4%，煤電約占三分之二。2016年，中國新增核電裝機容量約8吉瓦，使該國核電總裝機量達到34吉瓦，是核電史上迄今最大增幅。《中國日報》報導稱，中廣核集團董事長賀禹表示，至2030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至少要達1.3億千瓦。按照賀禹的設想，為此每年要新增4到6座核電站。這位核電高管由此強調了全國人大2016年通過的一項決議：至2030年，中國一定要有110座核電站並網發電。

中國認為核電站的投資建設以技術密集、投資額高著稱，核電“走出去”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高鐵一起成為中國的兩張“名片”。目前，中國在巴基斯坦已經建成四台核電機組，在建兩台“華龍一號”核電機組，規劃建設3台“華龍一號”核電機組。據巴基斯坦國家核委員會透露，在中國的幫助下，至2030年，巴基斯坦要新增7座核電站。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有28個國家計畫發展核電，規劃核電機組台數達到126台，裝機總規模大約1.5億千瓦，市場空間廣闊。

據中新社報導，2016年9月29日，中廣核與法國電力集團、英國政府簽署了英國新建核電專案一攬子協議，實現中國核電走出去的歷史性突破。英國核電項目包括欣克利角C、賽茲韋爾C、布萊德維爾B三大項目，其中布萊德維爾B專案將使用中國自主智慧財產權的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2017年3月24日，欣克利角C項目進行了核島廊道第一罐混凝土的澆築，標誌著專案主體

工程正式開工建設。據報導，價值180億英鎊的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被業內公認的迄今為止全世界造價最高的核電站。

安邦智庫警告，要嚴防“核電”被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成為中國的“國害”。美國西屋公司是世界主要的核電企業，研發了AP1000型所謂的第三代核電站。目前此機型正處試驗階段，還是“尚未經任何實踐檢驗的、不成熟的核電技術”。但美國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段，不排除在中國大量收買各類代理人，鼓動中國大上核電，特別是在長江、內地建設核電，推銷美國核電設備，並把中國作為他們的“核”試驗場。為達此目的，甚至連微軟的比爾蓋茨都赤膊上陣，利用其國際影響力跑到中國來鼓吹中國應該大上核電。2006年我國首先在浙江三門和山東海陽引進了4台被美國西屋公司標榜為“最成熟、最先進、最安全”的AP1000型核電站。事實證明它們只是個初級試驗品。這兩個核電項目原定2013年投入商用，但目前已經過去了十多年，結果連關鍵設備都未過關，系統調試更未進行，陷入“設計難以固化、風險難以預計、成本難以承受”的困境，而西屋公司“不用承擔任何技術和財務風險”。

2012年美國核管會對AP1000核電站提出“37項包括非能動安全系統在內的重要系統的測試試驗專案”，明確要求“西屋公司必須提供可靠的監測、試驗、評估資料”。西屋公司的回答非常直白：“必須等到中國三門、海陽核電站投運後才可能提供全部測試資料”。中國成為美國不折不扣的“核”試驗場，試驗過程中產生的智慧財產權全部歸西屋所有，在建設中和運行後的一切變化和未知風險則要由中國買單。三門核電站已發生超過2萬多次的設計修改仍未見頂，每次修改都由中方支付費用。這些年充分證明AP1000型的假話大話空話，給中國造成巨大損失。其中僅四台機組沒能按期發電的損失（不含利息）就已高達500多億元以上。

美國人自三哩島核事故後對核電非常慎重，他們在其國內限制和停止發展核電的時候，卻通過各種方式極力鼓動中國大搞核電。美國大力鼓動中國大搞核電，不遺餘力向中國推銷AP1000型核電站難以不說它是一箭三雕：和平時期拿中國做試驗場，賣設備賺錢；出事了對中國造成衝擊他們不承擔責任幸災樂禍，即便沒出事，中國也將面對核廢料難以處理的窘境；如果發生戰爭，這些核電站就是置中國人民於死地的攻擊目標。

燃煤電廠、風電等受到軍事攻擊後可以修復，而核電站則是無法修復的，成為持續不斷的核污染源。核子物理專家告誡，核電站如果遭到中子彈的攻擊，情況就會更為嚴重。一顆原子彈裡的核材料只有幾十公斤，而一座一百萬千瓦的核電站裡有一百多噸核材料和每年產生30多噸核廢料的積存，只要核材料吸收中子彈放射的千分之一的中子束，就會發生強烈巨大的核爆炸，其污染量相當於十萬顆原子彈！



南韓總統文在寅在古里核電廠與小朋友一同參加一號機的停機儀式。（美聯社）

呼籲人大代表 請全國人大釋法明確酷刑和虐待可訴或修法完善（轉載）

李蔚

全國人大代表：

我是北京市選民李蔚。因被監管人員遭受酷刑和虐待問題，請求你們履行代表職責，向全國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提出議案或建議，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被監管人員遭受酷刑和虐待是否可訴釋法或修法完善。

由於不知道任何全國人大代表的聯繫方式，本呼籲只能公開由熱心選民或其他人士轉達。

一、本呼籲源起之背景

(一) 個人遭受酷刑和虐待控告無果

2014年我因要求官員公開財產被判刑。2014年8月5日至2015年4月10日在北京市監獄天堂河監區(北京市新安教育矯治所)服刑，由於不認罪，期間曾遭遇酷刑虐待，具體遭遇是：長期每天近12小時被要求坐低矮的兒童座椅、不允許看書、看電視，不允許打親情電話和發家信等酷刑虐待。在遭受虐待期間，本人積極寫信向有關部門反映，雖然沒有接到答覆，但是受虐待狀況在4個月後有了改變。

1. 向檢察院駐新安所檢察室投訴無滿意答覆

雖然本人在監獄服刑期間遭遇酷刑虐待，但多次給檢察官寫信和通過獄警轉達約見，沒有回音。直到臨近出獄前1個月，檢察官才接見了我，但也沒有明確處理答覆。

2. 向北京市司法局投訴無滿意答覆

(1) 服刑期間寫給北京市司法局的投訴信無答覆

本人在服刑期間曾經給北京市司法局寫平信投訴，但無答覆。出獄後，本人於2015年7月向北京市司法局申請公開對北京市監獄天堂河監區(新安教育矯治所)四大隊原服刑人員李蔚于2014年11月寄給你局的反映受自己受虐待一事的材料處理結果，北京市司法局稱“無法查詢具體的信件辦理材料”。

據此，本人認為，監獄方面可能沒有投遞出該信件。

(2) 出獄後向北京市司法局投訴遭受酷刑虐待答覆不滿意

在得知北京市司法局可能沒有收到本人在服刑期間寄出的投訴信後，本人重新向北京市司法局投訴遭受酷刑和虐待。北京市司法局將投訴材料轉至北京市教育矯治局處理。幾個月後，因未收到處理意見，本人先後分別向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教育矯治局提起了針對酷刑投訴的政府資訊公開申請。北京市司

法局和北京市教育矯治局先後就申請公開的事項進行了答覆。答覆稱：由北京市教育矯治局答覆本人。本人反映受到酷刑和虐待的情況不屬實。

3. 向法院起訴不予立案

本人對於處理結果非常不滿意，遂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分兩次進行：

(1) 訴北京市教育矯治局政府資訊公開無效

請求法院責令該局在判決生效後立即對原告李蔚反映在北京市新安教育矯治所服刑期間被虐待一事組織深入全面調查，公佈相關證據，作出相應的、公正的處理，並就相關調查和處理情況重新向原告資訊公開。

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作出(2015)海行初字第01606號行政裁定書，稱：“李蔚就刑罰監管提出的政府資訊公開事項，不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據此裁定對起訴人李蔚的起訴不予立案。”上訴後，北京市一中院以(2016)京01行終263號行政裁定維持一審裁定，稱“刑罰執行是北京市教育矯治局的職責之一。北京市教育矯治局履行的行為屬《刑事訴訟法》授權實施的行為，李蔚對此提起的政府資訊公開訴訟，不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

(2) 訴北京市教育矯治局行政不作為

請求法院責令該局在判決生效後立即對原告李蔚反映在北京市新安教育矯治所服刑期間被虐待一事組織深入全面調查，公佈相關證據，作出相應的、公正的處理。

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8行初字第483號行政裁定書，稱：“李蔚要求北京市教育矯治局全面調查其反映的在服刑期間被虐待及公佈相關證據並作出處理一事，不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據此裁定對起訴人李蔚的起訴不予立案。”上訴後，北京市一中院以(2016)京01行終921號行政裁定維持一審裁定，稱“刑罰執行是北京市教育矯治局的職責之一。北京市教育矯治局履行的是《刑事訴訟法》授權實施的行為，而非行政行為。李蔚就要求北京市教育矯治局全面調查其反映的在服刑期間被虐待及公佈相關證據並作出處理一事，不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

(二) 涉嫌違法犯罪幹部遭受酷刑舉報無果

有消息說湖南省甯遠縣幹部王秋平和肖疑飛在雙規期間遭受酷刑，肖疑飛還寫出一本近20萬字的《我的雙規噩夢208天》詳細記載自己所遭受到的酷刑。他們就遭受酷刑提出過控告，但沒有結果。

在雙規和在司法程式中遭受酷刑的幹部包括以上兩人，但不限於這兩人。

(三) 其他人員遭受酷刑舉報結果不樂觀

被抓捕的709系列案的所謂在押嫌疑人長沙謝陽律師、維權人士吳淦在見到親屬委託的律師後，都曝出了遭受酷刑的消息。謝陽的辦案律師陳建剛已經公佈了詳盡的、曝光謝陽曾遭受酷刑的會見筆錄，其中有毆打、不讓睡覺，甚至牙膏、牙刷和衛生紙這些基本生活用品都不允許購買等等酷刑和虐待。維權人士吳淦在羈押期間遭遇幾天幾夜不讓睡覺、威脅、恐嚇、基本生活權利得不到保障等酷刑和虐待。吳淦先是在外地被抓捕關押，後轉到北京、天津與李和平、王全璋一同關押。在李和平被抓捕後1個月左右，他的弟弟李春富律師因為李和平發聲又被抓捕，2017年1月12日李春富獲取保回家。家人見到他時骨瘦如柴、精神失常，經北京知名精神病專科醫院北京回龍觀醫院確診為精神分裂。在他清醒時向家人透露，被羈押期間遭遇的酷刑逼供，又被強迫服用不知名藥物。

他們中部分人員通過律師向檢察院提出了對遭受酷刑的控告，但還沒有看到結果。

二、對遭受酷刑和虐待可以提起訴訟的必要性

現實是，關於酷刑和虐待被監管人員的情況，上級對於下級的監督往往流於形式，甚至存在上級領導指使和默許的情況。本人曾分別向公安部和司法部申請它們公開2007年至2014年該部下屬各級監管場所及員警因實施酷刑被控告及處理情況的部分或全部資訊，它們都答覆不存在。

檢察院對於酷刑和虐待的監督效果也不明顯，存在回避和推脫責任的情況。受酷刑和虐待的當事人、其代理律師或近親屬應該有就酷刑和虐待提起訴訟的權利。對於造成嚴重後果的，可以提起刑事自訴，對於未造成嚴重後果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這不僅是中國政府履行相關反酷刑國際公約的責任義務，也是保障人權的基本要求。

三、請求全國人大代表就反酷刑和虐待提出議案或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雖然不是我們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但是應該是選民的代表，聽取和反映選民、群眾的意見應該是你們的職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定：

“第四十二條 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

- (一) 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 (二) 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第四十三條 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要求。”

據此，請求全國人大代表向全國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提出議案或建議，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被監管人員遭遇酷刑和虐待是否可訴釋法，或修法完善有關反酷刑的法律符合法律規定。

請求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議案或建議包含但不僅限於以下具體事項：

(一) 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被監管人員遭受酷刑和虐待是否可訴釋法

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被監管人員遭受酷刑和虐待是否可以向法院起訴釋法，以明確對於被監管人員遭遇酷刑和虐待後，其本人、獲得其授權或並未獲得授權的親屬、代理律師是否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期望是：對於造成嚴重後果的，可以提起刑事訴訟；對於未造成嚴重後果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責令有關行政部門處理。也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對造成的身體和精神損害進行賠償。

(二) 若酷刑虐待不可訴即修法完善

若現行法律法規不支持被監管人員遭受酷刑和虐待後，其本人、獲得其授權或並未獲得授權的親屬、代理律師向法院提起訴訟，應修訂《刑法》和《行政訴訟法》有關條款，以有效遏制和反對酷刑與虐待。

(三) 明確對於不處理酷刑和虐待投訴的有關部門人員追究刑事和行政責任

我國相關法律法規追責條款不少，但是有些很難落實，部分原因在於追責條款規定不明確。期望能在法律上明確對於不有效處理酷刑和虐待投訴的有關部門人員追究刑事和行政責任。

雖然全國人大代表不是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但我仍期待您的履職，以不辜負法律重托。

此致敬禮！

北京選民： 李蔚
聯繫電話：13269350956/17090188210
2017年2月

推牆是一個合格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轉載) 冷焰

自2016年8月1日開始，“709事件”連續劇式大審判陸續上演。這是中國大陸的“莫斯科大審判”，然而由於黨媒殃視原本出於恐嚇和瓦解目的的愚蠢報導推動下，最終演變成中國大陸的“美麗島大審判”，讓被迫潛藏在網路和飯局間的“推牆”一詞正式進入全民視野，中國大陸大規模公開的政治反對運動就此登上歷史舞臺，為全民廣場革命運動埋下伏筆。

當2015年“709事件”發生時，特別是之後許多當事人被迫上殃視認罪時，有人指出中國的民主運動遭遇了滑鐵盧，將長期陷入低潮期。然而，兩年多過去，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悲觀的判斷完全背離了事實，正是“709事件”的發生，讓胡石根、周世鋒、屠夫吳淦、李和平等人成為凝聚公眾力量的標誌性靈魂人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人望；中國民間民主力量沒有因為此役大規模消滅，相反，正在迅速增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勇敢的“709家屬”們不妥協的積極對抗，獲得了民間廣泛的同情和認可，她們的遭遇更進一步將極權當局的暴虐本性呈現在公眾面前。

網民曾寧的評論被廣泛認同和傳播，他說：“709之後，不是極權和權力的強化和加強，而是極權和權力的堅冰崩裂的嘶嘶聲響。709所演繹的，是人性完敗極權，是人性的普通、平凡、平常乃至平庸，戰勝了極權主義的高大上。709所演繹的，僅僅是極權和權力的後期，極權和權力，僅僅為了滿足於自己丟不起人的臉面，已經搖搖欲墜的虛榮心，和堅決不能輸也輸不起的心態和決絕。

學者王江松說：“為了在實體上認定被告的顛覆罪，它們不得不一一羅列被告的種種言行，從而代替被告及其辯護人，直接成為自由民主思想（網民稱之為“胡石根思想”）的宣傳者，其宣傳的力度、廣度和效果遠遠超過被告及其辯護人一萬倍。”

“709事件”所帶來的積極影響，筆者不在此細論，單說為何推牆是一個合格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一、何為“推牆”？為什麼要推牆？

何為推牆？以筆者淺陋的見識，推牆即是公民在自然法理框架內秉承天性良知和社會公義，對現行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政策進行批判與監督，甚至是公開的政治反對活動，達成對政治制度的改造或重建。

這不是權力之爭，乃是真正的權利之爭。

在筆者看來，所謂牆就是制度缺陷，以及侵害公民權利的政策、法律、行政與執法行為，這些都關係到每一個公民自身的合法權益，因此，需要每一個人起而行之明確發對，非如此不能改善制度，不能保障自身權益，不能推動社會進步。簡言之，推牆是每一人必要的責任。

二、為什麼說你推牆是一項公民權利？

現代政治文明第一準則就是主權在民，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公民對國家政治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實施都有建言權、監督權和決定權，有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政策進行批判與反對的

權利，即每個公民都有推牆的權利。

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惡”，明確提出“有限政府”的概念，強調以基本人權（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來為政府行為設置“底線”，以法治和人民的“革命”權來抗擊政府強權。湯瑪斯·潘恩認為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

由此可見，政府的合法性必須以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為前提，並且國家權力必須受到制度的制約，而這種制度安排除了公權內部三權分立之外，還必須要有外部的公眾輿論監督和民間政治組織力量的制衡。

在民主國家，由於制度設計與法律制定上都允許民間政治組織反對力量的存在，所以，推牆是在法律框架內的行為，政府不可能也沒有能力將推牆者判定為非法分子，不能將他們抓捕、關押、迫害。

相反，專制統治出於對國家權力的壟斷，理所當然要禁止任何反體制的政治活動，禁止對統治者的任何挑戰。所以專制政治的根本問題就是如何禁絕反對派。在專制國家，由於其制度設計本身就是壓迫公眾的，必然要侵害公民權益的，因此，推牆顯得尤其重要。

三、為什麼說推牆是一項公民義務？

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在專制國家，政治制度的構建和政策的制定實施，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所以，為確保公民自身權益，對公權力的批判與監督不僅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公民必要履行的義務。

如果我們認同公共社會中權利與義務普遍對等原則，那麼一個合格的現代公民，他就必須對社

會不公發聲，對不合理的制度說不，明確反對公權力對公民的侵害，因為制度性侵害是非選擇的普遍於每一個公民，他不能“偷懶”讓別人來分擔自己所應承擔的風險，否者他就不是一個合格的現代公民。

如前所文所述，專制國家的制度設計本身就必然在侵害著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出於公民自覺，為捍衛自身的權益，每一個人也都有必要去履行變革制度的義務，去承擔自己應受的風險，去推牆。

四、結語

極權出於其邪惡本性，自其誕生之日起，國民就有了顛覆它的天然正義與權利及義務，而且矢志顛覆它的正義力量也隨其誕生，前仆後繼，延綿不絕，直至極權消亡為止，任何妄圖抹黑推牆、剝奪公民自主權的顛頽暴虐政權，都會被滔滔歷史長河吞噬摧毀。自身的權益，每一個人也都有必要去履行變革制度的義務，去承擔自己應受的風險，去推牆。



自由尊嚴（轉載）

徐琳

我懶得去看
那些扭曲的臉
我相信
罪惡的報應
一定會應驗
無須我耿記於心間

我的心只用來
記住那些美好的東西
邪惡與痛苦
最終都將成為過眼雲煙

不用問我有什麼要求
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
跟你們說個人要求
這本身就有損我的尊嚴

大眾的要求
就是我的要求
那就是
要你們下臺
這在我的公開言論中
已經說得很明顯
還用我再多說嗎？
問題只在於
你們根本就不願
也不敢
去兌現

不是我要故作清高
實在是你們的邪惡與虛偽
讓我不由自主地感到
討厭

也許你們可以
損壞我的尊嚴
用酷刑讓我
醜態畢現
那又怎麼樣？
至少我知道
什麼是尊嚴
並且有過深深的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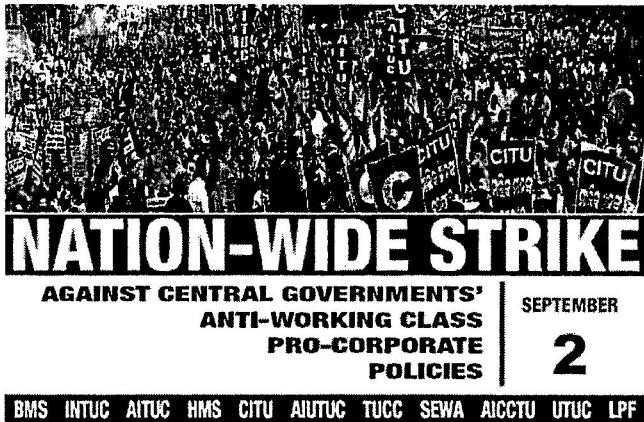
而你們
一輩子都不知道
尊嚴為何物
豈不是枉來一趟人間！

2017. 4. 28



印度歷來最大的總罷工

威介·普拉沙德



1.5億工人放下工作，而媒體持續地無視這件事。

對於2016年9月2日有多少人罷工這個問題，工會領導人保持沉默，他們根本無法提供一個確定的數字。但是他們肯定地說，這個罷工——自1991年印度採用新經濟政策以來的第十七次總罷工——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企業控制的新聞媒體——非罷工的擁護者——報導說，罷工者人數估計超過了1.5億人。一些報紙表示，有1.8億印度工人放下了工作。如果是這樣，那麼這是歷史上報導的最大總罷工。

但是，它並沒有引起媒體的多少注意。封面的故事很少，在靜悄悄的工廠和銀行，茶園和公共汽車站外遊行的工人的照片則更少。個別記者的敏感性只能偶爾地突破新聞老闆所建立的犬儒主義牆壁和他們想要創造的文化。對他們而言，工人的鬥爭造成日常生活的不方便。對公司控制的媒體來說，最好將罷工描繪成一種滋擾，描繪成對於似乎與工人無關的公民來說，是一種妨害行為。限制有關罷工報導的，是中產階級的暴行，而不是促使工人心甘情願地採取這種困難行動的問題。罷工被視為古老十月評論 2017年 第1期

的，過時的行動。並未視為工人表達失望和希望的必要手段。紅旗，口號和演講——這些都是尷尬的行為。就好像只要轉過眼睛，它們就會消失。

剝奪

一家重要的國際商業諮詢公司幾年前報告說，6.8億印度人生活在一無所有中。這些人——印度人口的一半——被剝奪了生活的基礎，如食物，能源，住房，飲水，衛生，保健，教育和社會保障。大多數的印度工人農民都是被剝奪者。百分之九十的印度工人工作於非正規部門，工作場所的保護措施很少，他們組建工會的權利幾乎不存在。對印度的經濟增長來說，這些工人並不是微不足道的。2002年，全國勞工委員會發現，‘印度人所有未來工作的主要來源’將出現在非正規部門，這些部門已經產生了超過一半的國內生產總值。那麼，印度勞工的未來是非正式的，偶爾會有權利，以防止對人類尊嚴的醜陋侵犯。印度工人的希望，根本不在印度現行規劃的議程上。

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無休止的世界巡遊再次脫鏈，但他並不理睬這些工人。他的目標是提高印度的增長率——根據他任古吉拉突邦(Gujarat)首府部長的例子——像食人族那樣像對待工人的權利和窮人的生活，這樣的增長速度就可以達成。出售國有資產，為私營企業提供巨額利潤交易，對外國直接投資打開印度經濟大門，就是其提高經濟增長率的機制。即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承認，這些戰略不會導致社會平等。這種增長方式導致更大的不平等，更少的工人權力和更多的剝奪。

階級鬥爭

只有4%的印度勞工屬於工會。如果這些工會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脆弱權力，那麼他們的力量就會進一步衰弱。自從1991年印度經濟開放以來，因為最高法院對工會民主的判決以及全球商品鏈，使得印度工人對其他地方的工人造成傷害，工會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損害。讓印度工會所擁有的巨大信譽的——不同程度地——是非正規部門工人和農民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工會所存力量得以增長的唯一條件，是繼續做他們自己所做的事情，即轉向廣大的非正規工人和農民，把他們融入工會和階級鬥爭的文化。

階級鬥爭不是工會或工人的發明。那是資本主義制度中勞工生活的一個事實。資本家購買勞動者的勞力，力圖使勞動力盡可能高效，富有成效。資本家留下生產力的這種收益，晚上把工人甩在貧民窟，讓他們設法找到能量以便能夠在第二天回來工作。正是這種尋求更多產出，為資本家貢獻更多收益的壓力，是階級鬥爭的本質。當工人想要更多地分享產出時，資本家不理會。正是罷工——一個十九世紀的發明——為工人提供了有意識地進入階級鬥爭的聲音。

在印度，第一次罷工發生在1862年4月至5月，當時何拉火車站（Howrah Railway Station）的鐵路工人進行爭取8小時工作制的罷工。罷工對中產階級造成的不便，同資本家為追求更多產品而使工人忍耐的日常“不便”，形成對比。1862年，這些工人不希望冗長的十小時輪班，耗盡他們的生活。罷工讓他們可以說：我們不會工作多於八小時。罷工的批評者會說，肯定還有其他方式讓你們的聲音被聽到。但對於工人來說，沒有別的方法，他們沒有“遊說”的政治權力，也沒有統治媒體的經濟力量。除非在工人階級的這些節日裡，人們是沉默的。

從古吉拉突邦(Gujarat)到喀拉拉邦(Kerala)

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家鄉古吉拉突邦的工人以極大的熱情加入了罷工。這包括七萬多個托兒所和中午餐飲工人以及巴夫納嘎(Bhavnagar)港口的工人。泰米爾納德邦的服裝工人和卡納塔克邦的汽車工廠工人關閉了他們的商店。銀行和保險員工聯合電力操作員工和鐵礦石礦工進行罷工，而全國運輸工人決定站在公車站和卡車站旁罷工。共產主義工會與其他工會結盟，確保工人的最大動員。

這次罷工中的每個地方工會都有自己的不滿，自己的憂慮和沮喪。但是，把這數百萬工人聯合起來的廣泛問題，則圍繞著工作場所民主的需求，圍繞著對更大份額的社會財富的需求以及對毒性較小的社會環境的需求。工人——通過他們的工會——把十二點要求交給了政府，但政府不理會他們。在最後一刻，當時看起來罷工好像是強大的，政府試圖做出小讓步。這還不夠。正如工會所說，這是一個侮辱。不要期望罷工本身會導致政府的重大讓步。畢竟，去年有1.5億工人罷工，政府的反工人政策並沒有轉向。相反，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加深了對“勞動力市場改革”的承諾——即取締工會，並加強了任意解雇工人的權力。

罷工表明的是，印度的工人還在積極進行階級鬥爭。他們沒有向現實投降。1991年，當政府決定向全球資本的動盪利益開放經濟時，工人就起而反抗。1992年8月，孟買的紡織工人穿著內衣走上街頭——他們宣稱，新秩序將使他們陷入赤貧狀態。他們的裝扮就是當前的現實。

威介·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學院的國際研究教授。他是18本書的作者，作品包括《阿拉伯之春》，《利比亞之冬》(AK Press, 2012), “窮國家：全球南方可能出現的歷史”(Verso, 2013)和“一個國家的死亡與阿拉伯革命的未來”(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 2016年)。

對韓國工會運動的鎮壓在日益增加

皮爾·羅瑟特

韓國政府想要一勞永逸地清理所有戰鬥的工會傳統，這個傳統的歷史根源來自於反對樸正熙（1961-1979）和全鬥煥（1980 - 1987年）獨裁統治的鬥爭。全國工會理事會（NCTU，成立於1990年），以及此後的韓國工會聯合會（KCTU，NCTU 1995年的後繼者）體現了這一傳統。這個傳統並非沒有困難和危機，它力求適應不斷變化的鬥爭條件。

自2012年12月以來，該國的總統是獨裁者的女兒朴槿惠（Park Geun-hye）：她按政令施政，其政權越來越專制。至於韓國企業集團（Chaebol），他們則積極參與針對工會權利的攻擊。

對韓國工會聯合會（KCTU）的反復鎮壓，今天已達到新的水準。為反對使勞動條件倒退的改革，反對績效薪酬制度（performance-based pay），公共部門舉行了罷工，這個罷工已被宣佈為“非法”的。韓國鐵路工人工會（KRWU）九名領導人成了“阻撓經濟活動”這一臭名昭著指控的受害者。為了破壞罷工，政府正在策劃“緊急仲裁”，這是被國際勞工組織（ILO）譴責為侵犯結社自由的做法。個體經營的貨車司機，因為打算罷工，也面臨刑事和民事訴訟。

二十多名工會領袖和活動分子被監禁，而他們唯一的罪行就是捍衛工人的權利。其中包括韓國工會聯合會（KCTU）主席韓生榮（Han Sang-gyun），韓國公共服務和運輸工人工會（KPTU）（運輸）副主席趙成德（Cho Sung-deok）；和韓國工廠建築工人工會（KPCWU）（工廠建設）主席李鐘華（Lee Jong-hwa）。

7月4日，韓生榮（Han Sang-gyun）被判處五年徒刑，原因是他於2012年至2015年期間組織了十三場反對朴槿惠政府的示威遊行。警方向1500多名工會會員發出了逮捕令，因為他們十月評論 2017年 第1期

參加了這些示威活動。對585名韓國工會聯合會（KCTU）成員展開司法程式。當局甚至設想使用“煽動叛亂”罪對付韓生榮，自從韓國獨裁政權垮臺以來三十多年，這個罪名還從未被使用過。

多年來，許多行業的結社權利遭受了嚴重攻擊。因此，在2013年，政府想強迫老師聯合會（KTU，是KCTU的一部分），修改其授權被解雇人員保留工會成員資格的章程。同樣的原因，它拒絕註冊政府服務工作者聯合會（KGEU）。2012年，外來勞工除了已有的工作，被禁止再尋找其它工作，使他們受制于雇主的憐憫。多年來，當局打壓外來勞工工會（MTU），後者是2005年成立的移民工會，其領導人被捕並被驅逐出境。

對工會權利的攻擊持續地變得越來越廣泛，直到保守的韓國工會聯盟（FKTU）與進步的韓國工會聯合會（KCTU）聯合舉辦了這一活動。朴槿惠政府特別公佈了新的“行政指導原則”，企業可以未經工會的同意，解雇被認為“表現不佳”的工人，任意修改工作條件。

在國際上，韓國的反工會政策受到國際特赦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等人權捍衛組織的廣泛譴責。

今天，面對新一波的逮捕行動，在國際交通聯合會（ITF）的支持下，發起了國際聲援的聯合呼籲。

請在這封信上簽字，保護南韓工會會員

立磐印地安保留區和我們的未來

阿里孫·波德里

立磐印地安保留區（Standing Rock）的示威抗議活動，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看到的最大的土著人民起義，預示著未來的樣式。已經分裂幾百年的各個部落，進入一個寬恕和慈愛的天地，因為他們有共同的使命：拯救地球母親，拯救她的水源。立磐印地安保留區（Standing Rock）的人們非常熱情。七個大型廚房每天為任何一個駐在營地的人提供三頓熱餐。立磐印地安保留區（Standing Rock）運動是未來的榜樣。這些土著領袖，正令人難以置信地將其生命和身體，置於爭取一個較好世界的奮鬥中。有一個資訊很清楚：即他們不會去任何其它地方。

在我們第一天參觀之後，我們遇到了一些組織者，他們正和立磐印地安保留區孩子們的父母見面。他們正在籌措一次家長會議，要確保立磐印地安保留區的每個孩子都能獲得優質的教育。他們正在收集學校用品，到這篇文章發表時，學校將完全開課。

立磐印地安保留區沒有貨幣。社區互相支持。這是一個沒有公司的土地。他們互助食物，互助衣服，互相教育。他們正在為自己和他人而戰鬥，為我們所有人而鬥爭。立磐印地安保留區是一個例子，它顯示了一個沒有公司的世界之樣貌。立磐印地安保留區的活動中心位於鬥爭前線，社區正在那裡同達科他州管道接駁項目（DAPL）進行對抗。我在那裡的那一天，我們參加了一個儀式，該儀式宣揚“水即生命”，“有其他形式的能源，但不是水”。

戰士們的社區圍繞著他們的同志，此人被鎖定在其中一台機器上。這台機器在深夜襲擊中剛剛挖了一個神聖的墓地。管道接駁專案（DAPL）工作人員的挖掘處，正是向他們準確報告過並要求得到尊重的地方。這是一個重大的侵犯人權行為，特別是考慮到，在我們稱之為美洲的這片土地上，發生過土著居民忍受了數百年的大規模種族滅絕。

綠黨總統候選人及副總統候選人吉爾·斯坦因（Jill Stein）和阿賈姆·巴拉卡（Ajamu Baraka）受一些領導人的邀請，將自己連結到其中一台機器。這個要求不是輕率的。當人們採取這種直接行動時，他們有被毆打，被噴胡椒霧或遭受更壞對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1期

待的危險。

當被要求在其中一台機器上噴漆時，吉爾和阿賈姆挺身而出，聲援人民群眾。阿賈姆噴寫了“我們必須非殖民化”。他不是作為副總統候選人，而是作為被壓迫社會的維權活動家而發言，對於非洲人後裔殖民化的世代影響，他有充分的個人和全域的理解。當吉爾被要求噴寫一個資訊時，她借此機會，以加蓋“總統印章”的聲明，使立磐印地安保留區的鬥爭成為中心。她噴寫了“我贊同這個資訊”，用它作為團結的標誌。

吉爾經常談到單獨一個人的局限性，甚至說到我們稱之為美洲的這個地方的最高職位的局限性。在立磐印地安保留區這樣的前沿社區，真正的變革在發生。吉爾和阿賈姆訪問和工作在前線社區，例如‘立磐印地安保留區’，參與‘黑人性命也是命’洛杉磯運動（在市政廳前露營，要求解雇警察局長查理·貝克）以及探望巴爾的摩的無家可歸者。他們正在利用他們作為綠黨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這個平臺，用其作為一種方式，不僅僅要提升這些鬥爭而且還要幫助把這些鬥爭團結起來。

有強大的力量要分裂左派，如果我們團結，組織起來和共同努力，我們就會迅猛地變得更強大。我們會失去什麼？選舉過程繼續把個人框住，而且有一個“名人”效應在發揮作用，這是我們必須對抗的。例如，當吉爾和阿賈穆進行訪問時，許多人第一次從主流媒體那裡聽到了“立磐印地安保留區”，還有，報導則一直圍繞著她在機器上的噴字，而不是領頭抗爭的土著人們的領導力和勇氣。

主流媒體正在嚴密的控制這個故事。他們不報導‘黑人性命也是命’運動的活動分子，巴勒斯坦權利活動家也在立磐印地安保留區戰鬥。主流媒體忽略了重點：更大的鬥爭在進行。人們日益對我們鬥爭的交匯包容性有更廣泛的瞭解，並且挺身而出站在一起，團結起來。

我堅信，我們生活在一個歷史性的非常時刻，人們開始瞭解，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存在種族，性別，階級，性取向，能力和性別認同的錯綜複雜性。如果我們決意站在一起，組織起來並為之奮鬥，那麼“立磐印地安保留區”就是未來的樣板。

團結雜誌社出版，2016年10月24日

五星運動的含糊性

佛朗哥·特格利托

在2016年6月的市政選舉中，五星運動（M5S，義大利語縮寫）及其年輕的候選人維吉尼亞·拉吉（Virginia Raggi）和基婭拉·阿潘丁諾（Chiara Appendino）在義大利兩個指標性的城市（首都羅馬，以及該國的主要工業城市都靈）獲得勝利，這再度激發了有關一個團體的政治角色及性質的問題，這個團體是由喜劇演員貝皮·格里洛（Beppe Grillo）創立的。

創始人和選舉動力學

“貝普·格里洛之友”的早期構建階段，要追溯至2005-2006年，但是2007年和2008年反對政治等級的“瓦芬庫洛日（Vaffanculo Day）”這兩天的運動，為2009年九月份五星運動的基礎創造了條件。在地方選舉中首次進行的投票測試尚不太明顯，直到2012年，五星運動（M5S）才在部分城市，包括熱那亞（Genoa）尤其是帕爾馬（Parma）在內的城市，取得了第一個重大成果，五星運動（M5S）獲選帕爾馬（Parma）市長。這是2013年大選取得巨大成功的起點，2013年五星運動（M5S）獲得8,691,106票，得票比例為25.56%，成為最大黨，而民主黨（PD）的得票率為25.62%。不過後者同其盟友贏得了29.18%的選票，使得它能夠在眾議院中佔有多數票。

在2014年的歐洲選舉中，五星運動（M5S）獲得21.16%的選票，相比之下，民主黨（PD）的得票結果（40.81%）出人意外，而貝盧斯科尼的‘貝盧斯科尼義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 Berlusconi）則大幅下滑（16.81%）。2016年，五星運動（M5S）在羅馬和都靈取得了勝利，但在米蘭和博洛尼亞遭到挫敗，特別是在那不勒斯，那裡即將卸任的市長路易吉·代·馬吉斯特里斯（Luigi De Magistris）作為公民和左派聯盟的領導人獲選連任。在議會選舉之前，最近的調查顯示，似乎有意投票給民主黨（PD）和五星運動（M5S）的人，以及有意投票給右派單一名單的人相近（各30%左右）。

有兩個人建立並確定了五星運動（M5S）的政治計劃。首先是演員貝皮·格里洛（Beppe

Grillo），他因為呼籲反對政治等級，腐敗和破壞環境而著稱，對廣大聽眾有很大的影響。再後來，是一家公司的負責人，吉安羅伯托·卡薩萊焦（Gianroberto Casaleggio），他是大型公司‘吉安羅伯托·卡薩萊焦’（Gianroberto Casaleggio）的業主，專門從事通信和行銷，由於互聯網路，使得一個集中並受控的組織得以形成。

五星運動（M5S）是一個非常垂直的政治力量，兩位領導人扮演著強勢主導的角色。卡薩萊焦（Casaleggio）最近的死亡並沒有改變這種設置，因為他的兒子已經取代了父親的角色，現在管理公司。但是，這個運動的發展及其在體制中的出現，卻增加了眾議院和參議院中議會黨團領導人的分量。在國家一級，組建了一個由五人組成的指導委員會，但格里洛仍然有最後決定權。

五星運動（M5S）的性質和特點

這個運動的特點是什麼？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舊術語，我們會說，它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運動，其組成有領導層，政治綱領和目標：使社會和體制運作民主化和合理化，懲治腐敗和特權，通過互聯網實行公共行動和公民控制的透明化。對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就沒有質疑，只有其過分行為和政策制定者的腐敗受到譴責。因此，五星運動（M5S）運動，並不會真正地針對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或資本主義緊縮政策展開。其主要口號是對誠實的要求，其中心政治主題是反對政治階級特權的鬥爭；運動自我表現為“淨化”和社會的“救主”。

因此，五星運動（M5S）既非右翼，也非左翼，不僅是因為它自己是這樣想的，而且還因為它有意識地把語言，資訊和具體建議混合使用，從而吸引左右兩派的支持。在某些領域，如環境，交通，公民權利或能源等方面，它捍衛左派話語權，五星運動（M5S）積極分子積極參與關於這些話題的運動。在其他方面，如移民，公共部門雇員的權利或工會的作用，它通常捍衛右派的立場。有一長串的聲明，其中可以看到一些領導人或活動家清楚發出的仇外聲調，其目的是收取非政治化民眾或右翼民眾的支持。

在構建一個模糊而可信的形象方面，正是領導小組能力的成功之處。這個運作之所以可行，因為它對應於工人的階級意識的大幅度下降，對應於不能忍受現狀而希求改變的群眾的平均政治覺悟水準的大幅下降。後者缺乏階級組織和集體反應，認為他們可以在五星運動（M5S）的

“反等級”立場中找到答案。只有考慮到本世紀頭十年發生的事情，考慮到工人和社會運動的巨大鬥爭，其災難性的失敗，普羅迪（Prodi）中左政府（2006-2008）的失敗，還有共產主義重建黨（Party of Communist Refoundation）的失敗，這種運動的快速增長才可獲得解釋。所有這些事態發展，導致了廣大工人階級深深的失望和沮喪，導致即使是最初級的階級意識的崩潰。2008年的經濟危機和破壞性的緊縮政策，使得這些現象結束：工人階級不再是政治主體。

格里洛（Grillo）運動的綱領

五星運動（M5S）批評了以往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軍事干預決定，但不質疑作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強權的義大利的作用。關於歐盟，根據不同情況，從退出歐元區到其他更溫和的建議，它採取的立場矛盾。歐洲議會的五星運動（M5S）成員加入尼格爾·法奇（Nigel Farage）的英國獨立黨（UKIP）所在的小組，表達了格里洛運動的所有含糊性，儘管這並不意味著採用英國極右黨的政治選擇。

五星運動（M5S）是一個很大的體制性力量。它在議會中進行民主鬥爭，目前它反對1948年義大利憲法的倫齊（Renzi）改革草案。但是，它並不想將這一行動與群眾民主運動結合，更不用說與工人運動的積極性相結合。也不關心制定一個關於就業和無保障臨時工問題的真正計畫，以處理經過多年緊縮後普通民眾的令人吃驚的生活條件。

格里洛運動提出的中心目標，是為中小型企業進一步減免稅，它認為這是發展的關鍵，給那些沒有工作的人以不確定的公民收入（實際上，這形同施捨）。其綱領不質疑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教條，不要求對經濟進行新一輪強力公共干預，不要求普遍減少工作時間，也不求捍衛集體勞動協議。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它的內在階級本質就是這樣的。

其領導人來自小資產階級，具有不同類型的就業背景，包括自由職業。普通活動分子來自不同的就業背景，有個體經營者或受雇者，多無知識份子屬性，但還不止於此。其中有些人的工作並不穩定。來自工業界和“傳統”工人階級的活動人士出現得更少。相反，私營和公共部門（包括工會的普通員工代表）的人很多，這些人的選票投給了五星運動（M5S）候選人。最近的市政選舉顯示，格里洛運動能夠在貧窮和邊緣化群體中獲得大量投票，這些群體渴望找到改變自己當下處境的出路。

內部結構以及同其他力量的關係

既成的內部結構，確保兩個主要領導人對整個組織的完全控制。決定是由成員——也許是受到指示的——列隊投票迅速決定的，沒有真正的公開辯論。當有成員被認為不符合組織基礎或根本不符合官方立場時，立即被驅逐，其做法也是如此。五星運動（M5S）的基礎結構是“會議”（電子會議，由運動網路自上向下發起）；直接的面對面會議很少見。但是，在競選活動的時期這些做法顯示了其重要性。

因此，從民主的角度來看，五星運動（M5S）的內部運作是相當有問題的。另一方面，有證據表明，對其他政治力量出現了極端的教派行為。在五星運動（M5S）成員的眼中，只有他們的運動：所有其他的力量都是舊制度的一部分，屬於一個“不純”的外部世界，應被改造重生。五星運動（M5S）宣導公民的參與，但只能在其方法的框架下，參與者須採納其運動藉以活動的形式。

今天，管理諸如羅馬和都靈這樣的城市，把五星運動（M5S）暴露在其政治對手的強烈攻擊面前，讓它面臨巨大的政治和行政問題。跟隨這些動態將是重要的。格里洛（Grillo）運動的成功，導致某些派別對他有幻想，突顯了我國左派的失敗和危機。但是，五星運動（M5S）工作的性質並不是建立群眾社會運動，因為群眾社會運動的本質是為了應對雇主及其利益代表者政府的政策。就像目前為止他們所做的那樣，“格里洛主義者（Grillistas）”將試圖從人民不滿中獲得選舉利益，譴責一些但只是少量的政府惡行，而不會質疑市場和資本規則。建設工人羣眾和反資本主義階級組織運動的任務沒有捷徑。五星運動（M5S）現象無它，只是確認了這一點而已。

拉丁美洲的反動潮流

邁克爾·洛維

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左派在大多數拉美國家贏得了選舉，這是一場民眾反對前政權新自由主義的慘痛政策的強力大潮。然而，必須區分兩種截然不同的左翼政府：

1)社會主義聯盟，這一派不違背基本的“華盛頓共識”，只是執行若干進步的社會措施。這種政府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盡可能地改善窮人的狀況——前提是不觸及富人的特權。巴西，烏拉圭和智利的左派或中左派政府是最明顯的例子。

2)反寡頭，反新自由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政府，其歷史視野是“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屬於這一類。

其他左派政府，如巴拉圭，尼加拉瓜，薩爾瓦多或阿根廷，似乎在這兩種類型之間，或在這兩種類型的邊緣之間。由於租金的社會再分配，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開採（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大多數這些國家的普通民眾取得了實質性的收益。但是，這些政府都沒有有效地處理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結構，也沒有進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真正嘗試。到目前為止，社會主義古巴連帶它的一切缺點，依然是這種嘗試的僅有經驗。

除了在厄瓜多爾，拉斐爾·科雷亞爾政府決定接受生態和土著運動的亞蘇尼公園計劃（Park Yasuni Project）的短暫時期之外，也沒有出現過擺脫對化石燃料依賴的嘗試。

這個建議允許開採這片土地上的石油，這個森林地區居住有農民社區，但要求北方的富國繳納其價值的一半，作為對厄瓜多爾人民的補償。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富裕的資本主義政府對此並不感興趣，科雷亞終於投降了，向石油公司開放了亞蘇尼（Yasuni）公園。

右翼的強烈抵制

自從一開始，寡頭集團就多次企圖重建其傳統統治，在美國帝國主義的協助下，發起各種政變行動，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委內瑞

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這些努力失敗了，因為有大規模的民眾運動反對他們。



然而，在2009年的洪都拉斯，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曼努埃爾·澤拉亞試圖執行一些進步措施，他被最高法院的一個得到軍隊支援的偽訴訟程式推翻了。

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巴拉圭總統盧戈身上，他在2012年被指控支持農民運動，被參議院解職。

在美帝國主義的外交支持下，專制的右翼政府取代了這兩個國家的進步領袖。

事實上，過去十五年來，反對左翼政府的寡頭反動活動從未停止過，只是現在取得了一些非常大的成果。

在阿根廷，最近因為親帝國主義的和新自由主義的右翼候選人毛裡西奧·馬克裡（Mauricio Macri）勝選，基希訥政府（內斯特爾，以及他死後的接替者，他的妻子克莉絲蒂娜）的左派庇隆主義歷程被終結。而在委內瑞拉，寡頭集團反對派贏得了議會選舉，因此嚴重挑戰了雨果·查韋斯的繼任者尼古拉·馬杜羅（Nicolas Maduro）的權力。

肯定與這些失敗有關的是 a)商品價格下跌而導致的困難經濟形勢，以及 b)兩國變化過程的局限性和矛盾。但這些也證明了資產階級反動力量操縱，欺騙和誤導大部分民眾的能力，因為他們幾乎壟斷了大眾媒體。

拉丁美洲最成功的左派政府可能是一個玻利維亞人埃沃·莫拉萊斯 (Evo Morales) 的政府，莫拉萊斯是土著農民領袖，他依靠大量民眾的支持，挫敗了新自由主義的寡頭勢力。但即使在這裡，政府也有幾項決定令人失望，遭到工人工會和土著人民運動的反對。

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多數人在最近的全民投票中拒絕給予埃沃·莫拉萊斯 (Evo Morales) 總統第三任期的可能性 —— 儘管這一投票還表示，過度的個人權力，遭到較為普遍的拒絕。

在冷戰結束後的現存國際關係中，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兇殘的軍事獨裁統治 —— 巴西，智利，阿根廷，烏拉圭 —— 的復辟，是不太可能的 —— 雖然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在外。



巴西的衝突

考慮到巴西在拉美經濟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這個國家目前的衝突對未來幾年的大陸是決定性的。

工人黨 (PT -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候選人迪爾瑪·魯塞夫 (Dilma Rousseff) 在2012年擊敗新自由主義聯盟，贏得了選舉，再次當選為總統。儘管她領導了一個 (溫和的) 左派運動，但她一當選，就採取了一系列明確的遵從新自由主義議程的措施。

在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對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大地主有越來越多的讓步，其主要領導人被提名為農業部長。

以國有的巴西石油公司 (Petrobras) 相關的腐敗醜聞作為藉口，反動力量 —— 新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黨派，大眾媒體，保守的法官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1期

—— 在中產階級的大力支持下，開始了彈劾迪爾瑪·魯塞夫 (Dilma Rousseff) 的暴力運動。一些更反動的演講者一直呼籲軍方再次奪取權力！

工人黨 (PT) 的幾位領導人以及右翼政黨 —— 前總統卡多索的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黨 (Brazilian Social-Democratic Party) 和“中間派”的巴西民主運動黨 (PMDB, Party of the Brazilian Democratic Movement) 參與了腐敗醜聞，包括議會和參議院議長，彈劾運動的領導人。

事實上，迪爾瑪·魯塞夫是少數沒有參與醜聞的政治領袖之一：彈劾的偽法律動機是國家預算計算中的一些違規行為！一些付款被拖延，以免逾越已核准預算的限制：這是大多數巴西政府經常使用的一個技巧。

一個廣泛的維護民主反對彈劾的聯盟組建了，稱為人民陣線，包括了從工人黨 (PT) 到最左翼的社會主義和自由黨 (PSOL)，工會，農民和其他社會運動的大多數進步黨派。這個民眾聯盟反對彈劾，但也批評迪爾馬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並呼籲徹底改變方向。巴西議會最近投票 (2016年4月) 彈劾迪爾馬，贊成票超過三分之二，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決定了。參議院和最高法院仍然要投票，但是期望他們會有不同的選擇，幾乎無可能。

這顯然是一場“合法”的政變！整個程式具有極為可笑而悲慘的味道，因為議會中彈劾程式的領導人愛德華多·庫尼亞 (Eduardo Cunha) 不同於迪爾馬， —— 他深深陷入巴西石油公司 (Petrobras) 醜聞。

拉美明顯地進入“低強度民主”時期。

邁克爾·洛維 (Michael Löwy)

巴西出生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是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和第四國際的成員。也是阿姆斯特丹教育研究所 (IIRE) 研究員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 (CNRS) 的前研究主任，他撰寫了許多書籍，包括切·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解放神學，祖國或地球母親？以及諸神的戰爭：拉丁美洲的宗教與政治。他是國際生態社會主義宣言的聯合撰稿人 (合作者居爾·廓威爾 Joel Kovel)。他也是2007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一次國際生態社會主義會議的組織者之一。

在全國土著大會（CNI）和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的聲明之後： 走向組織起來進行戰鬥的運動 墨西哥工人革命黨（PRT）



全國土著大會（CNI- National Indigenous Congress）和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 -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提出倡議，就一名土著婦女，和一個全國土著大會（CNI）的女發言人參加2018年總統選舉活動的可能進行磋商，工人革命黨（PRT – Workers’ Revolutionary Party）對此表示歡迎並致敬。 [1]

對於革命工人黨（PRT），這一政治舉措可以為底層的人們提供鬥爭和組織的另一種方法，抵制出現在結構性反改革中的資本主義運動，因為後者遠離普通公眾常識以及勞動者的權利，用生態災難性的大型項目破壞我國生態財富，以制度性暴力和國家恐怖主義，根據資本主義的邏輯，尋求利潤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在這個國家，暴力頻繁而無法停止，統治者對人民的蔑視和冷漠的程度越來越令人震驚，為了帝國主義利益，用國家力量驅動並維持剝奪資源和土地的大型專案，因此，正如全國土著大會（CNI）的聲明所言，對政府或立法機關（游離於社會控制之外的政府並且是反社會的）的抵制，具有更大的全民意義。面對這一切，迫切的是，不僅現在要組織抵制，而且要戰而勝之，做到這一步的可能性，來自於全國性組織的政治力量。撇開是否有政治轉向的辯論不談，“薩帕塔”倡議改變了總統候選人的政治格局。在這個領域，有一個

曾經缺席，也從未被邀請過的勢力，它可能的爆發，會擾動政治棋盤，因為它不僅代表了對抗制度的土著運動力量，其本身也是反資本主義的左派。

因為這一重要的政治倡議，我們面臨的是，通過對話，可能進行廣泛的反資本主義聯合，可以建立具多樣性的團結。這個國家所需要的深刻變化，要求有共同的努力，以及坦誠和公開地討論自下而上的一切變化的戰略方案。因此，在呼籲整個反資本主義左派團結的號召下，出席農村和城市的許多鬥爭，那麼，在全國土著大會（CNI）諮詢會議上通過的這一倡議就能得以完成。這些鬥爭出現在土著人民中，也出現在工人階級及其戰鬥組織之間，包括出現在工會，如教師運動或電子服務業（EMS）技工工會中，也出現在他們對人民及工人政治組織（OPT -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People and Workers）的建議中。在工人運動及其他抵抗資本主義野蠻行為的運動中，比如在反對殘害女性的鬥爭中，爭取婦女的權利（可以有女性代表土著候選人），總而言之，反對國家暴力及其可怕的處決和失蹤事件。顯然，還有阿育茲那帕（Ayotzinapa）學生的團結運動，以及為43個學生“他們活著離開，我們想要他們活著”的鬥爭。

要達到最全面的反資本主義團結，無疑需要對話和兄弟式的辯論。但圍繞這一倡議而開展的辯論，並不意味著取消資格和言語中傷。這類中傷說，反資本主義左派的獨立候選人擔當右派（相對於“墨西哥公約[Pact for Mexico]”的各方？）的角色，分裂左派的投票，是反對莫雷納（Morena）的詭計。這種誣衊並不新鮮。特別是出自建制左派的發言人口中，因為後者聲稱是左派的唯一代表。以前，民主革命黨（PRD）聲稱他們是“左派”。現在莫雷納（Morena）說民主革命黨（PRD）不只是左派，而是唯一的真正左派。2006年，民主革命黨（PRD）候選人洛佩斯·奧布拉多（Lopez

Obrador) 指責“其他運動”與右派結盟。2015年，打擊新自由主義勢力的運動和墨西哥公約結構性改革的部門並沒有投票給莫雷納 (Morena)，而是呼籲像教師們一樣棄權或抵制。洛佩茲·奧布拉多 (Lopez Obrador) 也侮辱了教師運動，指責這個運動在其對這個運動進行野蠻壓制的時候，聯手制度革命黨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必須明白的是，反資本主義左派，一般來說，反新自由主義鬥爭的運動並不是由建制左派來代表的。

最近幾個星期，對於9月15日抗議活動，洛佩茲·奧布拉多 (Lopez Obrador) 甚至反對“培尼亞下臺 (Peña Out)”的口號，說我們不想要一個瓦礫政府，並且要求一切鬥爭為2018年的選舉服務。相反，我們的理解是，獨立全國土著大會 (CNI) 候選人的提案，是組織一場鬥爭的運動，反對新自由主義寡頭政權的勢力，是一場鬥爭和組織運動，並非從屬於2018年選舉的鬥爭運動。墨西哥城市長奧夫拉多爾 (AMLO) 的提案和莫雷納 (Morena) 的提案是不同的。培尼亞·涅托 (Peña Nieto) 的過渡內閣，提出了確保“和平”過渡的建議，從而對執政罪犯實行大赦。建議延宕同過渡內閣也即和解政府的鬥爭，直至2018年投票前。實際上，現在不是確定一個投票方式的時候，而是要繼續反對寡頭政權和新自由主義計畫的鬥爭，包括在“培尼亞下臺 (Peña Out)”的邏輯內的鬥爭。但與此同時，就這是否應是一個單獨的，註冊或不做法律註冊(如1976年的坎帕 (Campa) 案)的運動，也可以進行戰略視角的討論。相比之下，奧夫拉多爾 (AMLO) 倡議提出維護資本主義邏輯的完整，正如最近在索諾拉 (Sonora) 表明的那樣，其提案是，外國礦業公司在採礦之前，它們只是簡單地納稅。

這種類型的候選人，例如我們幾年前見到的國家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候選人羅薩里奧·伊巴拉 (Rosario Ibarra) (她1982年的座右銘正是“與底層人民一同站起”)，是一個號召，呼籲底層人民組織起來鬥爭，而且還必要呼籲今天正在努力改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1期

變我們國家的人們團結起來，爭取獨立，公正，平等，多元文化，使我國免於剝削，控制和壓迫，這就是反資本主義邏輯。

特別重要的是，全國土著大會 (CNI) 和薩帕塔民族解放軍 (EZLN) 的公告強調候選人首選是一名土著婦女。這個做法質疑了基於專制，父權制和同性戀歧視的制度，也質疑了種族主義和同質化的基礎。而且這個質疑更重要的地方是，因為婦女不僅在家庭，工作和社會中遭受父權制的壓迫，而且還有對她們權利的攻擊，還有極端劇烈的暴力浪潮，其非人性的極端是殘害女性的。

對於革命工人黨 (PRT)，這種類型的候選人將成為土著人民重大鬥爭的象徵，土著人民不僅仍然在爭取自主權，而且面臨著強加在全國領土上的計畫，所有這些計畫都是要剝奪他們的資源，土地和文化。這也是婦女的象徵，象徵著今天她們呼籲反對父權制的歧視和暴力，喊出“夠了！”當政治建立在專制，父權制和同性戀歧視主義的基礎之上時，讓那些在危機中首當其衝者為人所知，也是質疑一個政權執政基礎的一個方式，因為這個基礎除了是專制的還是父權制的。這是與教師鬥爭團結一致的象徵，也是所有工人鬥爭和尊嚴的象徵。一個土著婦女的候選人，將成為年輕人的象徵，是所有被剝奪，受壓迫，遭歧視和被制度排除在外者的象徵，而那個制度的價值只是賺取更多的錢而不是生命和尊嚴。

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已經開啟了廣泛的反資本主義融合之路，通過對話，可以建立具有多樣性的團結。包括建議進行奪取權力鬥爭的反資本主義者和不主張這樣做的反資本主義者。這個國家需要的深刻變化，要求有共同的努力，要求坦率和公開地討論從基礎從底層進行徹底改變的戰略方案。

墨西哥城，2016年10月18日

註腳

[1] 見 “地球核心可能在顫抖 (“May the Earth Tremble at its Core”)

CADTM反債務政策史

第一部分：CADTM及其反非法債務鬥爭史：起源

本傑明·勒蒙納、埃里克·杜桑

這次採訪說明了反債務鬥爭的來龍去脈、談到了取消債務運動、實際經驗的基礎，政治鬥爭，還談到了公共債務概念的“不合規矩”，“非法”的或“令人作嘔”性質。換句話說，廢除非法債務委員會(CADTM)——前身為取消第三世界國家債務的委員會——同反對勢力和社會運動結盟，是如何的必要，因為其所涉及的概念和人民的聲音，一旦為政府聽到，就可以挑戰並壓倒債務及其“體制”。然而，CADTM的最優先事項是鞏固下述活動而不是遊說。^[1]

從非洲到拉丁美洲，公民參與審計帶來希望。但是，大部分時間裡，他們的目標會丟失，原因是忽視由十字軍變成的統治者，而統治者對金融體系有最終發言權。然而，有時審計是非常成功的。我們檢討對希臘主權債務的審計經驗，其中充滿了陰謀和意想不到的曲解，輕而易舉就被識破。新的國際合作（倫敦的希臘債務會議，應亞曆克西·斯普拉斯的請求而召開的希望夢想似乎是天真的，這個時候，根據埃里克·杜桑的看法，為了扭轉權力的平衡，單方面的主權決定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將分四個部分發表這次訪談。

廢除非法債務委員會(CADTM)及其反非法債務鬥爭史：起源

本傑明·勒蒙納：你是怎麼捲入反非法債務鬥爭的？

埃里克·杜桑：1975年至1994年，我教中學歷史和社會科學（在公共技術和職業教育機構）。上世紀80年代，我在列日市授課時，目睹了這個有20萬市民的城市的債務危機。它是災難性的，並實施了一項緊縮計畫（在那個時間，是極度艱難的）。這使得我和一群同事及不同領域的工作者，對列日市所負的債務起源進行分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1期

析。同時，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爆發了：墨西哥於1982年違約欠債。上世紀80年代，特別是在拉丁美洲，一些反對償還無法承擔之債務的舉措出現了。同樣，在非洲，年輕的布吉納法索總統湯瑪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於1985年接手債務問題。這使我以及1990年在比利時共同創立取消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CADTM)的其他人^[2]都相信，這是一個錯綜交叉的新課題，提供了正當理由，以便創造一個特定的組織，就像其他知名的組織，如綠色和平組織或國際特赦組織那樣。這個想法起源於一個特定的問題，並進一步深入到社會和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委員會開始時主要是一個比利時的組織。然而，通過其在法國的出版物，它在法國、瑞士西部、非洲法語國家和海地，變得如此出名，以至於我們如今出現在30多個國家裡。

說到教育，在高中教授全日制課程的時候，我繼續學習，2004年在列日大學和巴黎八大學完成了政治學博士學位。我的論文是關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第三世界進行干預的政治面。^[3]

本傑明·勒蒙納：在列日的經歷之前，你有政治活動嗎？

埃里克·杜桑：投入政治很早。1968年5月我還不到14歲，自1967年以來我已經活躍在學校裡。我生活在一個移民為主要來源（波蘭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希臘人，等等）的煤礦工人村莊。必須指出，我的父母是鄉村教師，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家庭藏書中沒有一本馬克思主義書籍。我的父親是一個非常活躍的社會主義黨成員。我的父母是反種族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人。我受到了反種族主義的鼓動，美國的瑪律科姆·X和馬丁·路德的鬥爭讓我非常感動（瑪律科姆·X的激進立場吸引我更多）。我覺得要絕對聲援工人們通過罷工和街

顯示威爭取他們權利的鬥爭。我參加了示威活動，反對核武器和越南戰爭。在 1968年5月，我非常密切地注視巴黎事態的發展。我如饑似渴地閱讀：毛、切·格瓦拉、《共產黨宣言》和許多不同流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作品。在1970年，這使我加入了稱為第四國際的托洛茨基派。共產主義同盟（後來的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 [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是第四國際在法國的成員組織，由阿蘭·克利翁（Alain Krivine）和丹尼爾·本薩德（Daniel Bensaïd）領導。在1970年6月，我與一個同齡的朋友搭便車到巴黎訪問該組織。我還不是滿16歲。我開始閱讀利昂·托洛茨基的主要分析著作，它幫助我瞭解蘇聯的蛻變，以及為什麼在全球範圍上有一個永久革命政策是重要的。

本傑明·勒蒙納：在第四國際內部，對債務問題有一個理解，還是相反，那個問題沒有引起多少人關心？

埃里克·杜桑：CADTM 成立於1990年。歐尼斯特·曼德爾，第四國際的一名高級領導人，他與我積極合作，於1986年，主張取消第三世界債務。^[4] 此外，1989年，一個聯盟在法國成立，參與者有歌手雷諾（Renaud）和作家吉爾斯·佩羅特（Gilles Perrault）這樣的人，倡議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聯盟被稱為 “Ça suffat comme ci”（法語口語，意思是 ‘夠了！’），它是廣泛團結的運動，響應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際主辦G7會議的呼籲而發起的。大多數左派發現此一呼籲是挑釁。雷諾被密特朗吸引，是其相當的崇拜者，他陷入兩難境地。對他來說，二百周年之際是他的信心危機。雷諾與他的南非朋友強尼克·萊格（Johnny Clegg）及馬諾·訥格拉樂隊（Mano Negra band）在文森斯（Vincennes）群眾免費音樂會做了表演。15 萬人出席了音樂會，而且至少有8萬人上街遊行。

取消第三世界國家債務的呼籲構成這一聯盟的主要議題。CADTM創立檔的比利時版本是取消第三世界國家債務的“巴士底呼籲”，^[5] 由革命共產主義同盟的戰士和吉爾斯·佩羅特（Gilles Perrault）寫於1989年。所以這個政治流派顯然產生於債務的問題，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然而， SOS反種族主義組織在法

國的成功，把這個1989年的巨大運動邊緣化了。幾年以後 SOS反種族主義組織和哈萊姆·德斯爾（Harlem Désir）佔據了‘夠了’（Ça suffat comme ci movement）運動空間。在那個時候，即在 1990年代，德斯爾與CADTM保持經常的接觸。於是，阿諾德·蒙特伯格（Arnaud Montebourg）作為國民議會的社會主義黨代表，專注於逃稅以及發展援助。SOS反種族主義組織推出時，他們試圖重現我們的巨大免費音樂會和集會的模式。債務問題在1996年法國里昂G7會議上重新浮現。比爾·克林頓、雅克·希拉克、托尼·布雷爾及其他出席了會議。在里昂發起的集會被稱為 ‘Les Autres Voix de la planète’（“該星球的其他聲音”），它激發了 CADTM 公告的標題。在分析方面和這個針對 G7會議的最後宣言的內容上，CADTM 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也是這個CADTM，資助了“該星球的其他聲音”運動在里昂的永久會址，為反G7首腦會議的聯合行動作準備。

南部國家的債務，北部國家的債務

本傑明·勒蒙納：那些年裡，在北方和南方債務之間的鬥爭中是否有任何明確的差異？

埃里克·杜桑：是的，1990年，北方債務並不是作為一個關鍵的問題來處理的，但我認為它會如此。關於當前的形勢，2006年-2007年美國爆發的銀行業危機，到2007年-2008年時席捲歐洲，一些國家把他們銀行的損失社會化以拯救銀行，於是公共債務飆升。我以及CADTM其他成員立即相信，在北方公共債務的新視角中，要把時間考慮進去。在別人明白之前，我們已經這樣做了。我們必須記得，在2008年-2009年，歐洲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的第一反應，是提出一項政策，這個政策看起來就像一個新凱恩斯主義的轉捩點。事實上，它只提供了臨時的社會減震器，因為北方政府極為擔心對制度的挑戰可能會變成巨大和有力的東西。在法國，薩科齊宣佈用補貼支持汽車工業。一部分反全球化運動和各種左翼派別沒有意識到，在公共債務大幅增加的藉口下，很快，一個極其殘酷的財政緊縮攻勢將出現。主流媒體稱之為“主權債

務”的東西，只有在 2010年與著名的希臘危機一起而顯明。事實上，一個廣泛的媒體運作發動起來，掩蓋基本事實，即持續的銀行業危機，以及歐洲中央銀行，歐洲聯盟政府和美國政府的一系列的倡議，以便用公共財政為銀行紓困。

2008 年 10月，在一篇文章[6]中，就 2010 年會發生什麼以及局勢會如何發展的問題，我寫得很清楚。總之，我們，CADTM，為實際發生的事情作了準備。我們還出版了兩本書，對此作了極好的說明：‘危機，什麼危機？’ (La crise, quelles crises?)，發表在2009年12月，還有‘債務或生活’ (La Dette ou la Vie)，於2011 年發表。同一年，後者在列日政治書展上被授予政治著作獎。我們還舉辦了研討會，自2010 年以來，我們說服了一大群運動，建立歐洲戰線，對債務償還問題進行質疑。

本傑明·勒蒙納：在八十年代的“夠了！”運動(“Ça suffit comme ça”) 和 2007年-2008 年之間，二十年過去了。但北方和南方國家的債務仍繼續讓人感受不同。你如何解釋呢？

埃里克·杜桑：在 CADTM 和1960年代及1970 年代所謂的第三世界主義之間有密切的聯繫。[7] CADTM 同第三世界主義的擁護者相連接，而我個人跟艾哈邁德·本·貝拉(阿爾及利亞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在1967年被 Boumedienne 推翻)[8]，弗朗索瓦·胡塔特 (François Houtart)，古斯·馬斯阿 (Gus Massiah)，安德魯·甘德·弗蘭克 (André Gunder Frank)，鐵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 (Theotonio dos Santos) 等人的關係密切。

CADTM 還與蘇珊·喬治 (Susan George) 合作 [9]，後者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寫了大量有關債務的文章，在作家吉爾斯·佩羅特 (Gilles Perrault) 1989年參與巴士底呼籲後，CADTM 與他也有合作。吉爾斯·佩羅特極其致力於出版他的書 ‘國王，我們的朋友’ (Our Friend the King) [10]，致力於保護亞伯拉罕·薩法提 (Abraham Serfaty) [11]，後者是哈桑二世監獄的政治犯。我還必須提到勒內·杜蒙 (René Dumont) [12]，他是第三世界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引入了生態面視野。因此 CADTM 的陣營裡包括在90年代初為60或70歲的人，那些參與聲援第三世界國家運動的人或領導人。CADTM

也連結到上世紀90年代的國際運動網路，如 農民運動 (Via Campesina，成立於1993 年)、世界婦女進軍 (the World March of Women 成立於90年代末)，南方大赦 (Jubilee South，成立於1999 年) 和課征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 (法文：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s pour l'aide aux citoyens，縮寫：ATTAC，為英文與法文中的“進攻”諧音，成立於 1998年-1999 年) 等。2001年，這些運動一起創建了世界社會論壇，CADTM 是其創始成員之一。

在其演化過程中，CADTM 改變了：它從聲援南方的北方組織，變成了一個北-南行動網路，探索債務系統的替代者。

2016年4月底 CADTM 在突尼斯舉行全球大會，一致決定保留其首字母縮略詞，但其名稱更改為 “廢除非法債務委員會 (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Illegitimate Debts)” 。同意更改名稱的動議，提出了下列論據：“CADTM 國內和國際工作的演變為建議的更改提出了理由。CADTM 誕生於1990年，當時正值第三世界國家發生全面的債務危機，還出現了取消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的要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第三世界’一詞的使用逐漸消退，主要是因為第二世界 (即現實社會主義集團) 逐漸消失，並且因為在第三世界範疇—現在被稱為發展中的國家裡，有各種各樣的發展 (新興國家，金磚四國，最不發達國家，重債窮國，等.)。隨著 2008 年的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影響，CADTM 的工作漸漸地開始包括北方國家的公共債務，但從來沒有忽視取消‘第三世界’國家債務的需要。我們證明了‘債務系統’作為一個整體，是如何逼迫北方和南發人民的。為了瞭解這個債務系統，在過去的五年，CADTM 一直系統地發展一個新的行動進程，並探索非法私人債務的問題，比如南方國家小額信貸，在那裡，婦女是第一受害者，還有農民、學生、遭受銀行驅逐家庭的債務，等等。

‘非法債務’的概念包括南方的和北方的債務，公共和私人的債務”。

讓我回顧一下， CADTM 主要出現於所謂的“發展中”國家：15 個非洲國家 (見 <http://www.cadtm.org/Africa,4686>) 6個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 (見

<http://www.cadtm.org/CADTM-XX-...>) 和 2 個南亞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關於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CADTM 目前出現在 6 個歐洲國家（見 <http://www.cadtm.org/Europe,338> ）和日本。

8月2日

由薩前德拉·德·薩卡（Suchandra De Sarkar）和斯內可·阿布斯托（Snake Arbusto）根據法語翻譯

註腳

[1] 這次訪談的刪節版刊登在 2016 年 3 月 ‘知識’ 雜誌第 35 期 名為 “資本與公共債務” 的特刊上

[2] 在比利時，1990 年為 CADTM 的建立作出了貢獻的法人，來自不同的背景，反映了 CADTM 的多元性質：普及教育運動 (Equipes Populaires — 一個繼續教育運動，結合了基督教工人運動 — 約瑟夫·雅克莫特基金會 (Joseph Jacquemotte Foundation)，萊昂·勒索伊基金會 (Léon Lesoil Foundation)，比利時進步猶太人聯盟 (Union of Progressive Jews of Belgium)，工會（公共服務總部 [CGSP] 的兩個區域工會或公共服務總工會 — 在列日和林伯格 — 公共服務總部 [CGSP] 的整個教學部門，安特衛普公共服務中心 [ACOD] 教育工會，列日省金屬工人聯合會），非政府組織（民族團結組織 [Peuples solidaires]、GRESEA 或另類經濟策略研究組，南北論壇，三大陸中心、無國界社會主義，發展合作的社會主義團結基金，樂施團結會，發展合作國家中心），團結委員會（海地手牽手委員會 [The Men Nan Men Committee of Haiti]，中美洲沙勒羅瓦委員會 [The Charleroi Committee of Central America]），和平主義運動（CNAPD 或和平與民主全國行動協調會、VREDE）、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共產黨）和一個婦女協會 “受虐婦女及其子女避難所”，社會主義工人黨（後來的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第四國際比利時支部，對於創立和推動 CADTM 具有重要作用。通過十分清晰和多元化的方法，它得以做到了。

[3] 埃里克·杜桑寫出了他的政治學博士論文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干預的政治面’ (Enjeux politiques de

l'action de la Banque mondiale et du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envers le tiers-monde) ，2004 年。它可以自由地在這裡下載：<http://www.cadtm.org/Enjeux-politiques-de-la-Banque-mondiale-et-du-Fonds-monetary-international-envers-le-tiers-monde> (法語)。也參見 <http://www.diffusiontheses.fr/50749> (法語)。

- [4] 參見歐尼斯特·曼德爾的 “地獄般螺旋上升的債務運動 (La dynamique infernale de la spirale de l'endettement) ”，發表在《國際通訊》 (Inprecor) ，1986 年 4 月，<http://www.cadtm.org/1986-La-dynamique-infernale-de-la> (法語) 和 <http://www.ernestmandel.org/new/ecr...> (法語)
- [5] <http://www.cadtm.org/About-CADTM>
- [6] <http://www.cadtm.org/A-Holy-Union-f...>
- [7] 請參閱 <http://www.cadtm.org/Eric-Toussaint...> (法語) 和 <http://www.cadtm.org/Le-CADTM-et-la...> (法語)。
- [8] 埃里克·杜桑，“紀念艾哈邁德·本·貝拉，獨立阿爾及利亞的第一任總統，他逝世於 2012 年 4 月 11 日，享年 96 歲”，<http://www.cadtm.org/Remembering-Ah...>
- [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san...>
- [10] <https://www.amazon.com/Notre-Ami-Fo...>
- [1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rah...>
- [1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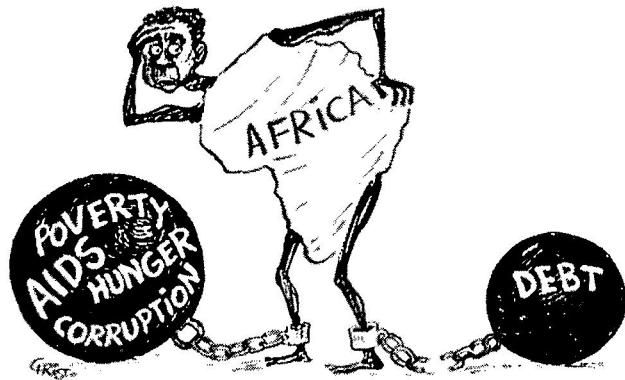
埃里克·杜桑

列日大學的高級講師，是比利時 CADTM (取消第三世界國家債務委員會) 主席，ATTAC 法國科學委員會的成員。他和達明·米勒合著了 “AAA。審核 取消 其他政策 (AAA. Audit Annulation Autre politique) ”，門檻，巴黎，2012 年，還有作品 “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六十問題，六十答案 (Debt,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Sixty Questions, Sixty Answers) ”，每月評論出版社，紐約，2010 年。他在此領域中發表了大量文章。他是第四國際的領導成員。

本傑明·勒蒙納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學研究員，專長在公共債務和國家與金融體系之間的聯繫問題方面。

第二部分：CADTM 反對非法債務方法的第一批測試地 盧旺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例子 本傑明·勒蒙納、埃里克·杜桑



採訪第二部分談及的是CADTM 1990年代和2000年初在盧旺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經驗。

債務審計：一個流產的先例 用CADTM方法計算非法債務的第一批測試地是什麼？

這要考慮CADTM和活躍在法國及其他地方的各種運動之間的融合背景。例如，CADTM非常積極地參與了新薩帕塔運動（neo-Zapatista movement），該運動於1994年1月1日在恰帕斯（墨西哥）公開露面，我們前往了墨西哥幾次。CADTM作為共同組織者，還參加了1994年10月西班牙舉行的大規模動員活動，反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慶祝其創立半個世紀而舉行的會議。這一行動是全球“五十年了，夠了”（“Fifty years, it's enough”）運動的一部分。至於在法國的聯絡者，我提到了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LCR)，1989年的“夠了（Ca suffit comme ci）”運動和1996年創建的反對7國集團的組織“該星球的其他聲音”（“Other Voices of the Planet”），此外，還要加上伽斯·米賽亞（Gus Massiah）領導的‘技術員，專家和研究者國際協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Techniciens, Experts et Chercheurs ‘AITEC’）[1]和國際團結行動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et d'initiatives de solidarité internationale , CEDETIM）[2]。還有當時由弗朗索瓦·格紮維埃·維沙威(François-Xavier Verschave) [4]領導的生存(Survie)運動，該運動反對法國對非洲的統治，對債務問題的重要性有充分的理解。生存(Survie)運動與CADTM有密切聯繫，部分原因是生存(Survie)運動和CADTM一樣，非常積極地譴責1994年在盧旺達發生的種族滅絕行為，以及由密特朗組織的“綠松石行動（Operation Turquoise）”。1995年，一個CADTM代表團前往了盧旺達，在布魯塞爾舉行了CADTM國際大會，討論了種族滅絕問題，討論了作為該計畫核心的債權人責任問題。從1996年開始，CADTM啟動了對盧旺達債務的審計，當時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é)領導的新政權仍然在吉佳利掌權。卡加梅想要澄清債務，設立了一個兩人小組與CADTM緊密合作。加拿大人蜜雪兒·曲蘇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是渥太華大學教授，經常為“世界報”（Le Monde diplomatique）撰稿，他和比利時樂施會秘書皮埃尔·嘎蘭(Pierre Galand)前往吉佳利，與CADTM密切合作進行調查。我與他們進行了廣泛交談，寫了一篇題為“進行種族滅絕的金融家(The Financiers of the Genocide)”的文章，引起了一定的注意[5]。



這是否啟發了CADTM的債務審計方法？

是的，即使經驗最終令人沮喪。沒有多少人知道，“綠松石行動”的任務之一，是攫獲掌握在吉佳利的盧旺達中央銀行的所有檔，並將它們全部轉移到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的戈馬，以防止新當局獲得書面證據，因為這些檔揭示了法國對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的種族滅絕政權的支持有多麼強烈。1996年，當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從剛果東部對蒙博托發起進攻時，卡加梅（Kagamé）得以獲取該集裝箱，將其帶回吉佳利，並打開了檔案，這些檔正是蜜雪兒·曲蘇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和皮埃爾·加蘭（Pierre Galand）的工作成果[6]。

換句話說，他們發現了“黑盒子”……

絕對如此，而且很清楚的是，法國銀行為哈比亞利馬納（Habyarimana）將軍的武器購買提供資金。埃及和中國也有牽連，因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砍刀，但法國向進行種族滅絕的盧旺達軍隊提供了更先進的設備。因此，一開始，國際主義運動與國家元首保羅·卡加梅接觸---這個行為在我們以後的經歷中會重現---，他想要透明度，並且讓那些通常保密的檔向專家開放。卡加梅掌握這一資源，威脅美國，法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公開種族滅絕的資金。華盛頓和巴黎，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質上都在說：“不要洩密！為了換取你的沉默，我們將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設最大信用額度來減少盧旺達的債務。我們將減少還款金額，我們將預先發放新貸款。”於是，卡加梅同流合污與他們一起玩。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沮喪的經歷，不僅在精力和道德上，而且是因為它設定的先例。因為在哈比亞裡馬納政權之前，盧旺達的債務水準很低；要求盧旺達償還的全部債務是專制政權承擔的債務，這也是醜惡的債務原則的典型例子，有些像剛果民主國面臨的債務。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於1996 - 1997年推翻獨裁者蒙博托後，皮埃爾·加蘭（Pierre Galand）和我與金夏沙的新當局合作（皮埃爾·加蘭是保持實

際接觸的人），首先是同社會運動合作。在比利時流亡20年的幾名CADTM剛果成員和同情者在蒙博托垮臺後返回他們的國家，並在金夏沙任職[7]。我們還與讓-巴蒂斯特·松德吉（Jean-Baptiste Sondji）長期接觸，後者是剛果前毛澤東主義戰士，這時他已成了卡比拉（Kabila）政府的衛生部長。

在這些情況下，你尋找什麼樣的支持或聯盟？
就我個人而言，我非常重視與社會運動（工會，小農民組織，學生組織等）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讓-巴蒂斯特·松德吉個人以外，對新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政府我不是很信任。這是個對債務償還進行挑戰的問題，這個債務是一些政權和機構要求剛果民主共和國償還的，這些政權和機構支持蒙博托，使他能夠持續執政超過30年。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設立了一個辦公室---“非法所得財產辦公室”（“Office of illicitly acquired property”），在同腐敗有關的個人財富聚集與該國的債務之間有明顯的聯繫。令人失望的事實是，在卡比拉與瑞士銀行家談判達成協議時，當時剛果民主共和國有可能讓瑞士法院強迫瑞士銀行家歸還他們與蒙博托合謀盜用的錢，這些錢是蒙博托存放在他們那兒的。但可恥的是，卡比拉同意與瑞士銀行家進行秘密交易，並放棄了正在進行的法律行動。

2000年夏天，我去了金夏沙，與剛果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合作，討論剛果民主共和國需要償還的可惡債務問題。我的書‘你的錢或你的生活（Your Money Or Your Life）’在學術界和剛果左派[8]中非常成功。在比利時這個前殖民強權國家中，CADTM發展了一個強有力的運動，旨在取消剛果民主共和國所負的可惡債務並凍結蒙博托家族在比利時的資產[9]。我們幫助編寫了活躍在比利時的所有非政府組織和南北團結組織的共同宣傳冊，要求取消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債務[10]。隨著CADTM開展的這些活動，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組織成為CADTM國際網路的成員（在金夏沙，巴剛果族（BAKONGO）地區，盧本巴希市（Lubumbashi）和姆布吉-馬伊市（Mbuji-Mayi））。

嘗試揭發盧旺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可惡債務，這些行動帶來的教訓是，不能信任政府。絕對必須優先與基層公民組織合作，與社會運動合作，與這樣的人合作，這些人決不放棄鬥爭直至真相顯明以及政府採取行動。

註腳

[1] 技術員，專家和研究者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chnicians, Experts, and Researchers），<http://aitec.reseau-ipam.org/spip.php?article130>

[2] 國際團結行動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et d'initiatives de solidarité internationale），http://www.reseau-ipam.org/spip.php?page=rubrique&id_rubrique=47/（法文）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stave_Massiah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C3%A7ois-Xavier_Verschave

[5] 1997年發表於<http://www.cadtm.org/Rwanda-the-financiers-of-the>，埃里克·杜桑，“盧旺達：進行種族滅絕的金融家，”第5頁，政治評論（Politique, La Revue），巴黎，1997年4月（法語版）。

[6] 參見蜜雪兒·曲蘇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皮埃爾·嘎蘭（Pierre Galand），

‘盧旺達外債的使用（1990-1994年）’。‘捐助者和債權人的責任’。‘初步報告’。渥太華和布魯塞爾，1996年11月。<http://www.globalresearch.ca/articles/CHO403E.html>（譯自法語原文的英語版）。又參見：蜜雪兒·曲蘇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等人。1995年，“盧旺達，索馬里，前南斯拉夫：武裝衝突，經濟種族滅絕和佈雷頓森林機構的責任”

（“Rwanda, Somalia, ex-Yugoslavia: armed conflicts, economic genocid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12頁，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夠了！（ça suffit !,）”運動，CADTM，布魯塞爾，1995年，182頁（法文）和蜜雪兒·曲蘇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世界銀行的政策以及盧旺達大屠殺”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35/03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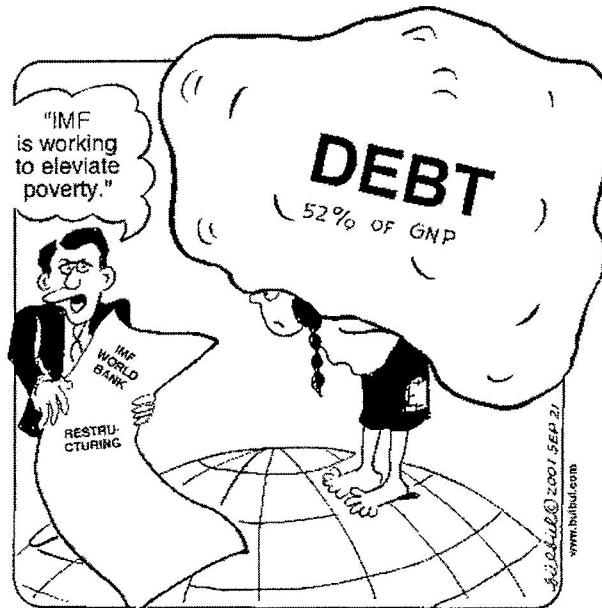
[7] 這些人中包括盧蒙巴剛果民族解放陣線（Lumumbist FLNC）的金訥洛·奧勒拉（Genero Ollela），他返回後，在金夏沙“非法所得財產辦公室”（“Office of illicitly acquired property”，OBMA）任職。一年後，他被投入監獄，拘禁的理由完全不公正，CADTM為他的釋放而努力。

[8] 參見 <https://www.monde-diplomatique.fr/1998/09/CASSEN/4039>（法語）和

http://www.cadtm.org/spip.php?page=imprimer&id_article=1663

[9] 特別參見 <http://www.cadtm.org/La-Republique-democratique-du>（法語）和 <http://www.cadtm.org/FG-Hemisphere-vulture-fund-s>

[10] CNCD行動-11.11.11（全國發展合作中心），取消比利時持有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債權（Toward Cancellation of Belgian-held debt claims over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布魯塞爾，2002年，34頁。



第三部分：阿根廷 – 反對非法債務的進一步行動

本傑明·勒蒙納、埃里克·杜桑

你們比較直接參與的地方還有哪裡？

在阿根廷，我與亞曆杭德羅·奧爾莫斯（Alejandro Olmos）接觸[1]，他是一位元非常勇敢的記者，在1982年獨裁統治還沒有崩潰的時代，他向阿根廷法院對非法而可憎的債務提起法律訴訟。他在獨裁統治結束之前起訴軍政府。我們廣泛合作，1997年，CADTM邀請他參加在比利時的國際會議。在那裡，得益于奧爾莫斯，另一種方法得以發展。由於他的訴訟，阿根廷的司法系統啟動了一項調查，給兩名法官分派了任務，要確定誰對阿根廷1976年至1982年間的債務負責。這導致2000年7月聯邦法院作出了一份195頁的裁決[2]。因此，這一裁決是由司法部門進行的阿根廷債務的審計結果。儘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阿根廷的統治階級對司法系統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以期使調查工作不能完成，但是這項工作還是做成了。1998年初，我與兩位負責調查的法官中的一位做了聯繫，他描述了其他法官，阿根廷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加在他身上的壓力，意圖防止裁決的下達。亞曆杭德羅·奧爾莫斯（Alejandro Olmos）於2000年4月去世，他非常鬱悶，相信調查永遠不會有任何結果。在他去世後僅幾個月，這項裁決就作出了。

在行動中出現的鬥爭觀念

獨裁結束，是不是就打斷了金錢權力的某種連續性呢？

是的，因為審計結果很清楚的顯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當時其董事是一個法國人，雅克·拉羅瑟日（Jacques de Larosière）[3]，他給予獨裁政權以支持，讓美國銀行資助魏地拉（Videla）獨裁統治[4]。你還必須記住，在獨裁政權垮臺後，軍政府的各個成員獲得大赦，特赦只在21世紀初才被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政府廢除。在20世紀90年代，曾是軍事獨裁政府直接共犯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實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政權，獲得特赦的軍政府成員，當然還有商人和主要私人公司，一起結成了聯盟，意圖把真正發生的事情掩蓋起來。

1998年以來，CADTM也在阿根廷與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Adolfo Pérez Esquivel）進行了密切接觸，[5]後者以捍衛人權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還密切接觸了‘對話2000和千禧南方’（Diálogo 2000 and Jubilee South）運動的組織者貝芙麗·基恩（Beverly Keene），以及‘瑪麗廣場母親’（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運動中的一員諾拉·科亭那斯（Nora Cortiñas），他們為了取消可怕的債務而不知疲倦地努力。

在獨裁政權初期（1976年3月）至2001年之間，債務增加了近二十倍（從不到80億美元接近到1600億美元）。在此期間，阿根廷償還了大約2000億美元，約為1976年3月債務的25倍。阿根廷的資本家在獨裁時期瘋狂地陷入債務，同時將大部分資金投向國外（通過資本外逃）。在獨裁時期，阿根廷資本家投放在最工業化國家和避稅地的資本總額大於借貸的資本總額。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僅在1980 - 1982年，獨裁統治的最後兩年，資本外流總額達210億美元。給阿根廷（和外國）資本家提供的最終禮物中，他們的債務在獨裁時期後期由國家承擔。結果，公共債務隨著私營公司的債務負擔而增加，因為國家承擔了對債權人的義務。自那時以來，阿根廷資本家一直保持著資本外流的政策。阿根廷債務顯然是惡劣債務的一個典型案例。

你去阿根廷繼續調查了嗎？

是的，我去了阿根廷，自從亞曆杭德羅·奧爾莫

斯和我提到過的阿根廷法官給我發了一系列文件後，我還在外地作了分析工作。我研究了可惡債務的積累情況，研究了把它洗清漂白的欺詐過程。^[6]是獨裁之後接手政權的總統勞爾·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是他讓洗錢運作成為可能。但是，如果債務本質上就是可惡的，那麼重組並不會讓責任終止。洗錢並不會洗去先前的罪行。如果借錢給獨裁政府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完全瞭解過去作為的情況下，重組阿根廷的債務，那麼它顯然有不可中斷的直接責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能只是說“阿方辛政權已經對債務作了再融資，那是一個民主政權”。

對於我們CADTM的人來說，這個情況也適用於盧旺達和剛果的債務。阿根廷的司法制度終於在2000年7月作出了重要裁決，但沒有作出判決。它把燙手山芋交給了阿根廷議會，而阿根廷議會由新自由主義右派控制，他們的“決定”就是“不作決定”。直到2014年9月，議會才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審計從獨裁統治的初期(1976年3月)到2014年阿根廷所積累的債務，我於2014年10月被邀請到議會做建議。^[7]但在實踐中，該委員會並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而贏得2015年選舉的右派，則埋葬了這個案件。ATTAC阿根廷(課征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法文：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s pour l'aide aux citoyens，縮寫：ATTAC))是CADTM國際網路的成員，在債務問題上非常積極，幫助了建立“暫停債務償還，審計債務，保護國家遺產和公共財產大會”

(Assembly for the suspension of repayment of debt and audit of debt in the defence of the national legacy and public property。)^[8]

幾年來，阿根廷停付債款，因此未能通過金融市場獲得外部融資。發生了什麼情況？

情況是：2001年12月，阿根廷臨時總統阿道阿道弗·羅德里格斯薩(Adolfo Rodríguez Saá)當局單方面暫停償還私人債權者和巴黎俱樂部(65億美元)800億美元的債務。要注意，它並沒有暫停向多邊組織，如世界銀行，貨幣基

金組織等還債付款。這種行動發生時，正當經濟危機，民眾反對多年來連續不斷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執行的政策，其中費爾南多·德拉魯阿斯(Fernando de la Ruas)是最近者。因此，當時國庫空虛，在街頭抗議的壓力下，阿根廷當局暫停了債務的償還。

從2001年12月至2005年3月，阿根廷持續暫停支付主權債券。暫停還債，對阿根廷經濟和人民有利。在2003年至2009年期間，阿根廷的年經濟增長率在7%至9%之間。一些經濟學家聲稱，這種增長的原因是阿根廷原材料出口價格的上漲，但很顯然，如果阿根廷繼續償還債務，則出口收入的增加(換句話說，向出口公司徵收的稅金)將用於償還債務。當局就不能夠投入公共支出幫助失業者，提高養老金並把退休福利擴大到每個人，也不能刺激出口業以外的其他地區的經濟活動。

2002年至2005年期間，阿根廷當局與其債權人談判，說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同意把其持有的債券交換為新債券。他們提出把暫停支付的證券，交換為新證券，但面值減少60%以上。作為對60%貶值的交換，阿根廷當局保證償還新債券，並按照阿根廷GDP增長率指數提高利率。這是通過債券交換重組債務：到2005年3月，76%的未償還債券已做交換，針對24%的拒絕交換者，這個多數被認為足夠提供安全保護了。那時，當局宣佈，拒絕交換的人將不再有談判的機會。

那麼，為什麼阿根廷在2010年再次重組債務呢？

事實上，與先前的聲明相矛盾，儘管有參加過2005年談判的經濟事務部長羅伯托·拉瓦尼亞(Roberto Lavagna)的抗議，阿根廷政府還是與剩下24%的債權人進行了新一輪談判。CADTM網路和許多組織反對新的債務重組。2010年，同剩下24%中間的67%達成了一項新的協定。總的來說，自2001年以來暫停支付的所有債券中，有8%“抵制”了這兩項協議。根據這兩項協定，除了上述交換債券的特點外，2005年和2010年發行的新債券還包含一些條款，

規定如果訴訟，美國法院將有司法管轄資格。

[9]

說到底，這種重組能被認為是成功的嗎？

阿根廷當局提出的重組是成功的，因為債務減少額（與國家要償還的債務存量額相比）很大 --- 在50%至60%附近。但是，作為回報，做出了巨大的讓步：高利率；以阿根廷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指標，這意味著該國實際同意將其增長利潤的一部分交給債權人；並在訴訟中放棄主權。

事實上，阿根廷的例子並不是一個要跟隨的案例，但它是靈感的來源。它顯示了暫停還債的益處，也顯示了談判協定的限制，對債權人作出了重大讓步。目前的情況是足夠明確的。首先，事實上，償還給債權人的金額相當可觀；阿根廷本身承認，自2003年以來，它已償還債務1900億美元。其次，雖然在2005年至2010年之間阿根廷的債務確實較低，但今天阿根廷的債務額比其2001年者為高。第三，阿根廷面臨來自禿鷲基金（vulture funds）的沉重而無理的壓力，後者拒絕接受交換提議，因為不僅是一個紐約法官，而且還有美國最高法院作了支持禿鷲基金的裁定。 [10]

你參與的阿根廷鬥爭，反對其訟棍式的頑固債權人，反對禿鷲基金，以重組國家的債務，鬥爭的性質是什麼？

比利時在2015年通過的關於禿鷲基金的法律，是我們工作的一個成果。[11] 我們不習慣搞遊說 —— 不像Eurodad（債務和發展歐洲網路），它是圍繞債務問題動員起來的另一個組織。然而，我們與比利時議員合作 —— 首先是同社會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合作，但顯然不同新自由主義者合作。這最終結出了果實，形成了大多數。關於阿根廷，我批評了該國總統克莉絲蒂娜·基什內爾（Cristina Kirchner）的取向，她絕對希望同巴黎俱樂部重組其債務。他們最終做到了，但其代價非常昂貴。[12] 他們的策略是遵守遊戲規則，即使克莉絲蒂娜·基什內爾在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1期

她的聲言中宣稱將採取與IMF對抗的策略，可是阿根廷人民對那個機構的意見微不足道。他們還認為弗朗索瓦·奧朗德真的會幫助他們，因為法國已經同意在美國禿鷲基金對阿根廷的訴訟中做阿根廷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一種顧問，字面意思‘法庭的朋友’）。他們錯誤地認為，奧朗德真的會“走這條路”。但他並沒有。至於阿根廷的戰略，CADTM參與其中的兩個中心問題是：

首先，2001年開始，阿根廷表明，可以不通過金融市場提供資金。[13] 從2001年至2016年年初，阿根廷沒有在國際金融市場發行任何一個傳統的債券。然而，其增長速度特別高，尤其是2002年至2009年國際經濟大危機期間，速度更高。如果它有不同類型的政府，阿根廷真的能夠加強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國的關係，建立南方銀行（見下文），再也不需要通過金融市場融資。挑戰是實現與歐洲不同的區域一體化 --- 即整合人民而不是整合資本。阿根廷也可以實施另一個財政政策，使特許部門作出貢獻，以加強其內在資金來源籌資。此外，他們需要擺脫採掘出口模式（extractivist-exportation model）。

第二，應該建立一個公民參與的債務審計程式，並將債務確定為可惡，不合法或非法的。

阿根廷錯過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

最後，在2015年下半年的選舉期間，強硬右翼隨著毛裡西奧·馬克利（Mauricio Macri）當選為總統而回歸。他肆無忌憚地投入禿鷲基金和所有其他債權人的懷抱，滿足了他們的所有要求，發動了對經濟社會權利和公共財產的新一輪自由主義攻擊。2016年，在比利時，CADTM開始了一場法律戰爭，以防止保羅·辛格（Paul Singer）的禿鷲基金NML（總部在美國），使前面提到的比利時法律宣告無效，該基金是極力反對阿根廷的。[14]

譯者：斯勒科·阿布斯托（Snake Arbusto）與威奇·布若特（Vicki Briault）

註腳

- [1] <https://es.wikipedia.org/wiki/Aleja.....> (西班牙文)
- [2] <http://web.archive.org/web/20130927...> (西班牙文)
- 或http://cadtm.org/IMG/pdf/sentencia_... (西班牙文)
- [3] 雅克·拉羅瑟日 (Jacques de Larosière)，1929年出生於巴黎，從1978年至1987年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管理主任。之後，他是法蘭西銀行的行長 (1987-1993)。從1993年起，他領導了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BRD)。同年，1993年5月3日，他被選入法國道德與政治科學學院 (Academy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獲得亨利·卡迪納爾·德盧巴克席位。從1998年起，他擔任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銀行首席執行官蜜雪兒·佩布繞 (Michel Pébereau) 的顧問。
- [4] 關於美國公司 (包括銀行) 串謀的更多資訊，參看胡安·巴勃羅·博霍斯拉夫斯基 (Juan Pablo Bohoslavsky) 和威爾利·奧珀經哈芬 (Veerle Opgenhaffen)，“企業共犯的過去和現在：為阿根廷獨裁融資” <http://harvardhrj.com/wp-content/up.....> 這份報告還強調了美國政府給獨裁政權的支持。奧巴馬政府最近解密了一些關於這個時期的檔，參見 <https://icontherecord.tumblr.com/po....>
- [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dolf...>
- [6] 參見 <http://cadtm.org/Argentine-maillon-...> (2002年，法文)
- [7] 見 <http://www.cadtm.org/Argentina-must...> and <http://cadtm.org/Argentine-Eric-Tou...> (2014年，法語或西班牙語)
- [8] <http://www.cadtm.org/Audit-de-la-de...> (法語)
<http://www.cadtm.org/Resistances-a...> (法語)
- [9] 放棄國家主權的這一行為，要追溯到那個在1976年上臺的軍事獨裁政權。
- [10] 關於阿根廷和禿鷲基金，請參見：雷諾·費文，“禿鷲可以掩蓋其他人”，白地圖，晚報，2014年6月23日 (法語)；“禿鷲基金：美國法院對阿根廷的裁決激怒債務正義活動家” <http://www.cadtm.org/Vulture-funds-...>；“沒必要同禿鷲基金談判”，<http://www.cadtm.org/No-Need-to-Neg...>；“比利時反禿鷲基金的新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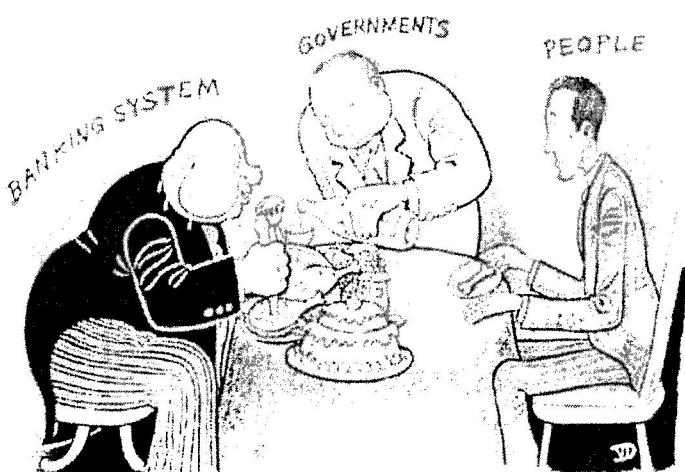
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榜樣”，
<http://www.cadtm.org/New-anti-vultu...>；“債務正義活動家呼籲對禿鷲基金做管制”，
<http://www.cadtm.org/Debt-Justice-C...>；“把阿根廷逼入牆角的禿鷲基金也沖你而來”，
<http://www.cadtm.org/The-vulture-fu...>

[11] 見法律文本和解釋性聲明：
<http://www.dekamer.be/FLWB/PDF/54/1....> (法語和佛蘭芒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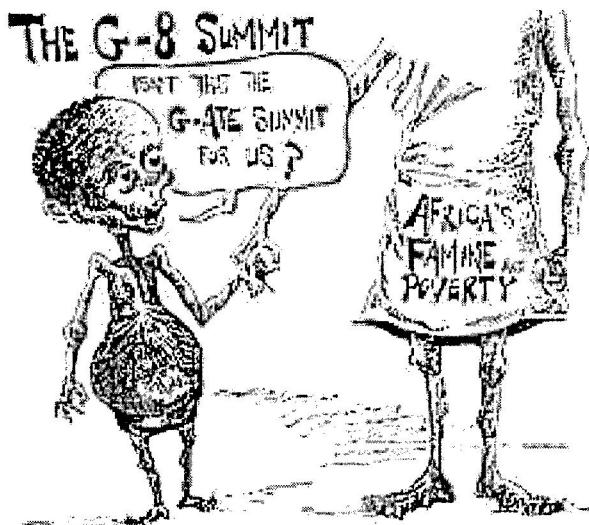
[12] <http://cadtm.org/L-Argentine-signe...> (法語)；又見“阿根廷：來自抵制非法債務前線的鼓舞人心的消息”，
<http://www.cadtm.org/Argentina-enco...>

[13] 在另一種情況下，本傑明·勒莫瓦納令人信服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多年，法國並沒有以訴諸市場方式而為自己融資。見：本傑明·勒莫瓦納 (Benjamin Lemoine)，債務次序，國家不幸和市場繁榮的調查 *L'ordre de la dette , Enquêtes sur les infortunes de l'État et la prospérité du marché* (LaDécouverte, 2016) (法文)。參見：<http://www.cadtm.org/Refaire-de-la-...> (法文)和<http://www.cadtm.org/Livres-pour-1...> (法語)

[14] 見雷諾·費文，“禿鷲基金：當投機者想在比利時制定法律時” <http://www.cadtm.org/Fonds-vautours...> (法語)



第四部分：從急切的希望到厄瓜多爾的成功： 南非、巴西、巴拉圭和厄瓜多爾的例子 本傑明·勒蒙納、埃里克·杜桑



審計的歷史是一個急切的希望和失敗的嘗試交替變化的故事情嗎？

回到20世紀90年代：當時我們正與南非左派作廣泛合作。1994年，後種族隔離時期的過渡真的開始了。國際上和南非內部的反種族隔離運動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把取消種族隔離時期的債務，作為其要求之一，在1989年的巴士底紀念日，這一點正好獲得反種族隔離的南非歌手約翰尼·克萊格(Johnny Clegg)的明證。不過，結果還是令人失望，儘管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監禁期間呼籲取消種族隔離的債務，但他並未採取實際行動取消債務，而是承認了他所反對的政權所承擔的債務。這在南非的左派，非洲人國民大會，南非共產黨和反對種族隔離鬥爭中脫穎而出的大勞工聯合會(COSATU)中引起了極大的失望。裂縫擴大了，一方拒絕放棄取消種族隔離債務的要求，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1期

另一方玩弄起現實政術，放棄原則，理由是“如果我們想吸引外國投資者，我們就不能與債權人衝突”。

簡而言之，審計的流產歷史確實比審計的成功史更長：盧旺達，剛果（金），巴西[1]，菲律賓[2]，巴拉圭，辛巴威[3]，更不用說我們稍後將討論的希臘審計。

你覺得可以解釋失敗的因素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巴西的情況。盧拉·達席爾瓦率領導的工人黨(PT)，在2003年上臺之前，贊成進行債務審計。事實上，2000年9月，他支持一場公民投票，對以後的政府施加壓力。在社會運動召集的有600萬參與者的全民投票中，超過90%的人要求對債務進行審計，而這是1988年以後的巴西憲法所要求的。超過90%的人也表示，贊成在審計期間暫停償還債務。就個人而言，自從1990年以來，我和盧拉和工人黨(PT)的許多成員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在20世紀90年代，我去了巴西十幾次。盧拉於1991年受到CADTM的邀請來到比利時。1996年，CADTM邀請約瑟·迪爾塞烏(Jose Dirceu)參加里昂反七國集團首腦會議；他是當時工人黨(PT)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一個前遊擊隊員，從2003年開始，他的情形非常糟糕。他們在2002年年底贏得選舉，一上臺，工人黨(PT)和總統盧拉就阻止了進行審計的任何可能性，並重新與貨幣基金組織達成協議，提前償還現有貸款。我最後一次會見盧拉，是2003年6月在日內瓦，八國

集團依雲(Evian)峰會期間。自2003年1月1日起擔任巴西總統的盧拉，邀請我與另外兩人會晤，另兩人是法國課征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ATTAC。法文：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s pour l'aide aux citoyens)主任和義大利社會論壇(Italian Social Forum)的代表。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同意在債務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而他現在拒絕質疑這個債務問題，正如他剛剛開始的對退休制度做新自由主義改革一樣（這同時，也是法國退休制度的Fillon改革時期）。隸屬於CADTM的巴西組織稱為“公民債務審計”；自2000-2001年以來，它非常活躍，2009年成功地促成了議會債務審計委員會的設立。但委員會內的工人黨(PT)議員與其他保守的議員聯盟，防止對巴西債務的合法性進行質疑。

鑑於過去兩年巴西經濟形勢嚴重惡化，外債和內債問題遲早會重新成為關注焦點。

現在來看看巴拉圭的情況，這個國家與巴西，阿根廷和玻利維亞接壤。2008年12月，已任職半年的進步總統費爾南多·盧戈邀請我協助設立一個審計巴拉圭債務的委員會。我去了亞松森，與總統進行了單獨會談，隨後參與了巴拉圭政府的會議。^[4]很顯然，巴拉圭債務的大部分可以被認為是可惡的，因為這是1970年代初在兩個軍事獨裁政權——巴西軍政府以及巴拉圭斯特羅斯納(Stroessner)將軍^[5]獨裁政權——之間簽訂的不合情理的合同（事實上總是這樣）。該問題條約涉及伊泰普水壩的建設和運營，伊泰普水壩當時是世界上最大的。我根據巴拉圭專家整理的高品質檔，徹底研究了這個問題。此外，比利時CADTM小組的前成員巴拉圭法學家雨果·魯伊斯·迪亞斯·巴布納(Hugo Ruiz Díaz Balbuena,)已經成為盧戈總統的顧問，這也有助於促進該接觸。^[6]由於盧拉總統政府的壓力，公民參與的國際審計舉

措失敗了。我應該指出，巴西的主要公司是巴拉圭的主要債權人和剝削者。當費爾南多·盧戈即將簽署創建審計委員會的總統令時，他陷入了保護巴西債權人的盧拉及其政府的壓力。為了說服巴拉圭政府放棄進行國際審計的想法，並取消對巴西公司的債務要求進行質疑的呼籲，盧拉作出了一些微小讓步，將巴西每年為伊泰普大壩電力向巴拉圭支付的數額增加。^[7]然而，儘管有來自巴西的壓力，事實上，巴拉圭共和國總檢察長在2010年和2011年進行了一次審計^[8]，當時我應盧戈總統的邀請回到了巴拉圭。2012年6月，他被“議會政變”推翻^[9]，這個政變模式2009年在洪都拉斯發生過，最近則出現在巴西，用於推翻2010年接替盧拉的巴西總統迪爾馬·魯塞夫。^[10]

右派之所以能夠在巴西和巴拉圭使用這種形式的體制政變，部分原因是兩國的左派政府無能力強硬地面對債權人，進行結構性改革。最終，民眾對其同國內和國際大資本和解的政策感到失望，廣泛地損害了他們初上臺時所獲得的強烈民眾支持。當右派決定採取行動時，左派的人民太失望，太迷惘以至於無法捍衛政府領導人。

一個案例，是試圖用國家力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破壞審計，結果遭到挫敗，這就是厄瓜多爾的情況。是的，這是真正的唯一案例，根據審計結果，政府暫停還款，對債權人取得了重大勝利。^[11]

反權力與權力的關係：厄瓜多爾的成功

或許我們可以花一些時間談論厄瓜多爾的情況---與反對派的聯繫如何，誰會成為未來的領導人？

CADTM的一般原則是不與當局合作，而是與反對派運動 --- 基本上是社會運動或紮根於工人階級的激進政治力量合作。隨著某一國家政治形勢的演變，反對派的人民也可能成為政府的一部分。厄瓜多爾是一個典型的例子。CADTM同那裡的接觸，要追溯到1999年。在厄瓜多爾，有關取消債務的運動啟動於1997 - 1998年，當時，國際禧年運動展開了。[12] 2000年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個禧年，一系列與第三世界國家有關係基督教組織---不包括CADTM --- 委身於“2000年必須是債務豁免的一年”的運動主題。厄瓜多爾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左派基督徒參與了這個運動。1999年和2000年，我被‘取消債務’基督教運動，特別是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心（CDES），邀請到厄瓜多爾，這個中心不屬於基督教。在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心（CDES）的倡議下，與挪威的基督教組織保持密切聯繫，我們支持一項具體的運動，譴責挪威向厄瓜多爾和其他四個發展中國家（獅子山、秘魯、牙買加和埃及）索取債務。挪威在八十年代開始就舉債給這些國家，把他們的漁船賣給這些國家，從而拯救了挪威船廠。這一運動的雄辯，導致挪威政府取消了它在2006年要求償還的債務。這是審計非法債務運動的具體勝利。[13]

現任國家總統拉斐爾·科雷亞來自小資產階級，基督教運動和童子軍運動，也受到解放神學的影響。2007年，當科雷亞上任時，他任命了反債運動領導人裡卡多·帕蒂諾（Ricardo Patiño）為財政部長[14]，他與我一起工作多年。2007年4月，我受裡卡多·帕蒂諾的邀請，參加了“債務運動”會議，參與建立審計委員會的總統令的制定，該總統令由拉法爾·寇里亞於7月份發佈。在4月下旬至2007年5月初，我還建議厄瓜多爾總統及其財政部長，建立一個南方銀行，包括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巴拉圭和烏拉圭。[15] CADTM在向厄瓜

多爾當局提供諮詢意見的同時，還參加撰寫了拉丁美洲社會運動給七個有關國家總統的幾封公開信，呼籲他們建立一個真正的南方銀行，替代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以便支援人民而不是資本的融合。[16] 最後，從7月份開始，我作為CADTM的代表，非常積極地參加了拉斐爾·科雷亞總統設立的審計委員會，確定1976 - 2006年期間簽訂的非法債務。我們的工作報告於2008年9月提交給政府，並於2008年11月公佈[17]，結果是暫停償還大部分要求厄瓜多爾償還的債務，主要是美國銀行持有的政府債券。單方面暫停付款行動導致了重大的勝利。厄瓜多爾要求債權人接受減少有關債務的70%的做法。這使得2009 - 2010年初就可以大幅增加社會支出。

我們不一定要說，我們合作的運動將會上臺。但事實上，與我們一起工作的人，都在某個時間進入了政府。例如，2007年，我遇到了2010年成為該國中央銀行行長的厄瓜多爾經濟大臣迪戈·波甲（Diego Borja），他告訴我：“你不記得我了，我在1992年來到比利時參加過CADTM會議。當時我正在魯汶天主教大學學習經濟，我參加了CADTM討論會。”當然在希臘也有這個情況。我們回頭再談。

譯者：斯勒科·阿布斯托（Snake Arbusto）與威奇·布若特（Vicki Briault）





註腳

- [1] 見“案例研究：巴西”；
<http://www.cadtm.org/Case-Study-Brazil>
- [2] 2004年，菲律賓議會投票表決，贊成進行債務審計，但嘗試失敗了。
- [3] 2009年，來自左翼的反對穆加貝政權的辛巴威政府財政部長，派翠克·邦德（Patrick Bond）聯繫了CADTM，對債務進行了審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阻止了計劃的實施。
- [4] 關於盧戈總統，其政府與埃里克·圖桑之間的這次會議的新聞事件，請看2008年12月在巴拉圭反對派新聞界發表的翻譯文章：
<http://www.cadtm.org/Paraguay-The-Belgian-who-met-with>; <http://www.cadtm.org/Paraguay-Un-politologue-belge> (法語);
<http://www.cadtm.org/Paraguay-Le-pays-sera-touche-par> (法語)。也見
<http://www.cadtm.org/Paraguay-should-speed-up>.
- [5] 在1973年伊泰普條約簽署之際，巴拉圭在塞斯特納將軍(General Stroessner)的獨裁統治下，

他從1954年至1989年掌權，而巴西則是在加西亞·穆迪茨（Garrastazú Medici）的獨裁統治下（1969-1974年）。

- [6] 雨果·路茲·迪阿茲·巴布納（Hugo Ruiz Díaz Balbuena）和埃裡克·圖桑（Eric Toussaint），“債務審計：一個社會運動應該抓住的工具（L'audit de la dette : un instrument dont les mouvements sociaux devraient se saisir）”，2004年7月9日出版，<http://www.cadtm.org/L-audit-de-la-dette-un-instrument> (法語)。雨果·路茲·迪阿茲·巴布納（Hugo Ruiz Díaz Balbuena）是法學博士，領導CADTM的法律部門，直到2005年。從2008年開始，到2012年6月推翻費爾南多·盧戈總統的政變，他是他最親密的顧問之一。參見：雨果·路茲·迪阿茲·巴布納（Hugo Ruiz Díaz Balbuena）的“La décision souveraine de déclarer la nullité de la dette (宣告債務無效的主權決定)”
<http://www.cadtm.org/La-decision-souveraine-de-declarer>, 3658 2008年9月8日出版 (法文)。
- [7] 見 <http://www.cadtm.org/The-Itaipu-Treaty-signed-in-1973>。另見對2009年7月巴拉圭與巴西協議的意見：<http://www.cadtm.org/Un-accord-historique-sur-Itaipu-ou> (法文)
- [8] 見 <http://www.cadtm.org/La-Cour-des-Comptes-du-Paraguay> (法文) 和 <http://www.cadtm.org/La-Cour-des-Comptes-du-Paraguay>, 7724, (法文)
- [9] 見 <http://www.cadtm.org/Paraguay-Lugo-denounces-a-coup>
- [10] 見埃里克·圖桑（Eric Toussaint），“巴拉圭（2012年6月）- 洪都拉斯（2009年6月）：另一種政變（Paraguay (juin 2012) - Honduras (juin 2009) : d'un coup d'État à l'autre）”，
<http://www.cadtm.org/Paraguay-juin-2012-Honduras-juin> (法語)。另見：“美國及其不守規矩的拉丁美洲‘後院’（The U.S. and its unruly Latin American ‘backyard’）”，
<http://www.cadtm.org/The-U-S-and-its-unruly>-

Latin

[11] 見蓋爾·赫利 (Gail Hurley) “因為厄瓜多爾政府力求按其條款重新談判債務，弱小厄瓜多爾成了焦點” 2007年5月24日，
<http://www.cadtm.org/Tiny-Ecuador-in-the-Spotlight-as> 以及埃裡克·圖桑和達米安·米勒 (Damien Millet) 的“債務：厄瓜多爾的歷史轉捩點”，2007年5月27日，
<http://www.cadtm.org/Debt-Ecuador-at-a-historic-turning>；也見（法文）
<http://cadtm.org/Video-L-audit-de-la-dette-en>；
<http://cadtm.org/En-2007-2008-l-Equateur-a-ose-dire> 和 埃裡克·圖桑，雨果·阿裡阿斯·帕拉薩斯 (Hugo Arias Palacios)，阿裡斯·恰茨泰凡奴 (Aris Chatzistefanou) - “視頻：厄瓜多爾債務審計，七分鐘的摘要”，
<http://www.cadtm.org/Video-The-Ecuador-debt-audit-a>

[1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bil...>

[13] 參見 CADTM，“CADTM讚賞挪威關於取消惡意債務的倡議，並呼籲所有人同意此舉：
<http://www.cadtm.org/CADTM-applauds-Norway-s-initiative>

[14] 有關西班牙文的詳細傳記，請參閱：
<https://es.wikipedia.org/wiki/Ricar...> 和英文：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ar...>。這個傳記是可靠的。

[15] 埃里克·圖桑 (Eric Toussaint)，達米安·米勒 (Damien Millet)，丹尼爾·門訥瓦 (Daniel Munevar) --- 南方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 世界銀行的替代方案。CADTM非常高興能夠利用廣泛的公眾互聯網，2007年在孟買 (印度)由Vikas Adhyayan Kendra (VAK) 發佈“南方銀行”，見<http://www.cadtm.org/Bank-of-the-South-An-Alternative>， 埃裡克·圖桑 (Eric Toussaint)， Banque du Sud et nouvelle crise internationale(南方銀行和新國際危機)，Liège-Paris，CADTM-Sympse，2008 (法文)，免費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1期

下載：<http://www.cadtm.org/Banque-du-Sud-et-nouvelle-crise>；另見“南美洲國家簽署銀行協定條款”，<http://www.cadtm.org/South-American-countries-sign>

[16] 紿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厄瓜多爾，巴拉圭和委內瑞拉總統的首次公開信，<http://www.cadtm.org/Open-letter-to-the-Presidents-of>，2007年6月26日發佈，給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厄瓜多爾、巴拉圭、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總統的第二封公開信，<http://www.cadtm.org/Second-open-letter-to-the>，於2008年12月7日發佈。

[17] 見厄瓜多爾債務整體審計的最終報告——執行摘要，2008年，<http://www.cadtm.org/Final-Report-of-the-Integral>，西班牙文見<http://www.cadtm.org/Informe-final-de-la-Auditoria>。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the Dying Liu Xiaobo!

Jun Xing

After eight years of suffering in prison, Liu Xiaobo was granted medical parole after being diagnosed with terminal liver cancer. This has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s once the news was announced. According to senior doctors, he may have half a year to live if he can get targeted therapy.

According to *Ming Po*, dated 27 June, during the student movement of 1989, he joined hunger strike for three days, and he successfully negotiated with the student leaders and the army commander to let all the several thousand students withdraw peacefully from the Tiananmen Square. In 1991, he was convicted for the offens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but exempted from criminal punishment for his “major meritorious action” for having avoided the possible bloody confrontation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96, he was ordered to serve three years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for disturbing public order”. In the same year, at the labor camp, he married Liu Xia. After his release, he resumed his freelance writing. In 2008, Liu was detained due to his participation with the *Charter08* Manifesto. Then he was formally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nd was sentenced to eleven years’ imprisonment in Mianzhou Prison, Liaoning Province. What Liu has done is to exercise his ri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but was wrongfully sentenced to prison and now dying. He was awarded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showing that he has already obtained sympathy and support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Liu should not have been sentenced to prison because of his speech. He then suffered seriously and is dying. He should be freed unconditionally, rather than to be granted medical parole. This is a very urgent call to free him. Otherwis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hould be charged of intentional murder and to be condemned by history.

Actually, Liu Xia asked for medical report from the hospital but was rejected. She also repeatedly asked for overseas treatment but rejected again and again. Due to his deteriorating health which could not afford chemical treatment, he was then sent to hospital. However, he got the terminal liver cancer which cannot be cured in the country, and worse still, he cannot be allowed to go abroad. It obviously shows that the authorities have an intention to murder him.

The brutality and savagery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s already outraged the public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There is widespread call for an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Liu Xiaobo and letting him go abroad for medical treatment. Whether the CCP and the government make compromise largely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ressure.

29 June 2017

Comment on the Work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Zhang Kai

China is not a socialist society

In March 2017, i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behalf of the State Council,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presented the report by playing the same old tune: "we should follow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uphold the Party's fundamental political guidelines, and keep to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rely on the inexhaustible creativity of the people, unit as one, and forge ahead. It is our firm belief that by doing this, we will make great new achievements in China's development." "We should keep in mind the fact that China remain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pursues a people-focus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n fact, after Deng Xiaoping adopted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door, China has marched towards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nonpublic sector has developed prosperously and even takes more advantages. Drawing from a news report of *Wen Wei Po*, dated 12 March 2016, which quoted from *Nanfang Daily*, dated 11 March,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nowadays nonpublic sector accounts for over 90% of the market, produces over 60% of GDP, takes over 80% of employment, owns over 90% of fixed assets, and makes over 67% of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please see *October Review* no. 240). All these show that the public sector is no longer the core of Chinese economy, or "the main part" claimed by the CCP. It has already been replaced by the nonpublic sector.

Socialism means a society based on public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At the moment, China is a society largely based on private ownership.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s one in which everybody has a job,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and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contribution. In the higher stage,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China is far from either.

The report admitted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was 4.02% at the end of 2016, which was the lowest rate for over several years. Last year, there was over 80% of employment rate. In other words, there was still nearly 20% of unemployment rate. In 2015,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the rural poor was 70 million. In 2016, the number reduced by 1.24 million. Until 2020, China is expected to completely accomplish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port claimed that there were "deception, falsification,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numbers in poverty elimination work". So, the official number of the poverty elimination is not reliable. All these show that China is not socialist society in the Marxist sense.

Nonpublic sector takes more advantages

The Report proposed that in future, the government would further support the nonpublic sector and even declared that, “we will do more to energize the nonpublic sector. We will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public sector. We will work actively to develop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We will encourage nonpublic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reforms. We must ensure equal rights,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fair rules, and further expand market access to the nonpublic sector. All industries and sectors for which entry is not explicitly prohibited by laws or regulations should be open to different types of market entities; all industries and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overseas investment should be open to Chinese private capital; and all unjustified activities that impede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should be stopped.”

Moreover, the Report stated that “we will improve the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Protecting property rights means protecting labor, protecting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and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We will work faster to improve the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and protect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e property rights of economic entities under all forms of ownership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citizens. We will encourage people to start businesses, make innovations, and create wealth, and we will inspire and protect entrepreneurship, and ensure that entrepreneurs can run their businesses and make investments with peace of mind. Activities that infringe on the property rights of businesses and citizens must be investigated and dealt with severely; anything that has been done wrong must be corrected.”

While reviewing the governmental achievements, “with an 8.5-percent increase in profit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reversed the previous year’s negative growth of 2.3 percent.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GDP fell by 5 percent. Economic performance improved markedly in quality and returns”, it stated that “the trial replacement of business tax with value added tax (VAT) was extended to cover all sectors, slashing the tax burden of businesses for the year by over 570 billion yuan and reducing tax burdens in every sector”, including nonpublic sector which enjoyed both the polices of proactive fiscal and tax reduction.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head

However, the Report addressed many difficulties, “yet we must not lose sight of the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China faces in pursu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nternal forces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Overcapacity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in some industries. Some enterprises face difficulties in their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Economic prospects for different regions are

divergent. Fiscal imbalance is becoming great. And potenti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isks cannot be overlook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mains grave, and in particular, some areas are frequently hit by heavy smog. We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steps to combat pollution.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causing public concern in housing, education, healthcare, elderly care, food and drug safe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t is distressing that there were some major accidents in the coal mining,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ectors.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Some reform policies and measures have not been fully implemented. Excess fees and charges being levied on businesses and difficulties facing individuals who want to access government services remain standout problems. We still see problem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being enforced in a nonstandard, unfair, or uncivil way. A small number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are lazy and neglectful of their duties or shirk responsibility. Corruption often occurs in some sectors.”

The above is a modest description, by saying “some” and “a small number”. It has not yet discussed about bureaucratic authority and official corruption. Yet, it mentioned that China was beset with difficulties at home and abroad, “2016 was an unusual year in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China was confronted with an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world saw the lowest economic and trade growth in seven years, growing volatility i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sudden and frequent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Domestically, China faced multiple difficulties: major structural problems, prominent risks and dangers, and mount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China found itself in a complex environment as reform entered a critical stage, profound changes took place affecting interests, and factors impacting social stability grew.”

This complex environment is due to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promoted by the CCP. The more China opens its door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 more affected by them as the interrelations are frequent. In the domestic aspect, private property is getting strengthened, leading to problems such as class polarization, a widening gap of the rich and poor, serious class struggle, and serious confli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This was exactly what the Report called “factors impacting social stability grew”.

In order to boast about President Xi Jinping’s great leadership, the Report mentioned his name ten times. It indeed deployed a tactic of personal cult. Yet, he has to bear the weight of responsibility of causing and worsening the above complicated dilemma.

15/04/2017

Hong Kong:

- 2** 28 years of anniversary of June-fourth Democratic Movement in Hong Kong.....Zhen Yan
3 Three poems on June-Fourth Democratic Movement.....Chan Chong Hei
4 Problems with a small committee for electing HK chief executive, so universal suffrage is a must....Wei Bo
5 The illusion of opportunism in the election of HK chief executive.....Dai Chun
7 20 years of HK's handover inducing overwhelming criticisms.....Juan Di
8 To feel a closeness to a beloved one despite being separated by a great distance.....Ka Ling
9 Easter Festival 2017.....Chan Chong Hei
11 "Occupy Central" action and one country good system. (reprint).....Tang Jingling

China

- 12**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the dying Liu Xiaobo!Jun Xing
13 Chinese authorities should release the innocent lawyers and dissidents in prison.....Lau Shan Ching edited Letter to those who are concerned with Case 709 and Wu Gan's friends (reprint).....Xu Xiaoshun (Wu Gan's father)
18 Comment on the Work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Zhang Kai
20 A plan for untold disaster: ChemChina's acquisition of Syngenta with astronomic price.....Qing Yan
21 China's nuclear plan is not desirable.....Po Mi
24 To urge representatives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o make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ppealing laws on torture and abuse (reprint).....Li Wei
26 To overthrow a wall is the right and duty of an eligible citizen (reprint).....Leng Yan
28 Freedom and dignity (reprint).....Xu Lin

International

- 29** The world's largest general strike.....Vijay Prashad
30 Increased repression of the trade-union movement in South Korea.....Pierre Rousset
32 Standing rock and our future.....Alison Baldree
33 The ambiguous nature of the 5 Star movement.....Franco Turigliatto
35 Reactionary tide in Latin America.....Michael Löwy
37 After the declaration of the CNI and the EZLN: the road to a campaign to organize and fight... PRT, Mexico History of the CADTM's anti-debt polices
39 Part 1: The history of the CADTM and its struggle against illegitimate debt: OriginBenjamin Lemoine, Éric Toussaint
43 Part 2: The first testing grounds for the CADTM's methods to counter illegitimate debt: the examples of Rwanda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Benjamin Lemoine, Éric Toussaint
46 Part 3: Argentina - Further Action against Illegitimate Debt.....Benjamin Lemoine, Éric Toussaint
50 Part 4: From dashed hopes to success in Ecuador: the examples of South Africa, Brazil, Paraguay and Ecuador.....Benjamin Lemoine, Éric Toussaint

Article in English

- 55**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the dying Liu Xiaobo!Jun Xing
56 Comment on the Work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4卷第1期 (總第242期)

2017年6月30日出版

香港	2 紀念六四28周年在香港.....振言
	3 又到陸肆詩三首.....陳中禧
	4 小圈子選特首多弊病 反證真普選的必要.....微波
	5 從特首選舉看機會主義的虛妄.....大進
	7 回歸二十周年 香港被一面倒地抨擊.....涓滴
	8 天涯若比鄰.....家寧
	9 復活節 2017.....陳中禧
	9 “佔中”行動與一國良制(轉載).....唐荊陵
中國	11 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病危的劉曉波.....軍行
	12 當局須即釋放無辜被囚律師和異見人士.....劉山青輯撰
	13 致所有關注709案及吳淦的朋友的公開信(轉載).....徐孝順(吳淦父親)
	18 簡評國務院的工作報告.....張開
	20 後患無窮：中國化工天價收購先正達.....青岩
	21 中國核電計劃不可取.....破謎
	24 呼籲人大代表請全國人大釋法明確酷刑和虐待可訴或修法完善(轉載).....李蔚
	26 推牆是一個合格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轉載).....冷焰
	28 自由尊嚴(轉載).....徐琳
國際	29 印度歷來最大的總罷工.....威介·普拉沙德
	30 對韓國工會運動的鎮壓在日益增加.....皮爾·羅瑟特
	32 立磐印地安保留區和我們的未來.....阿里孫·波德里
	33 五星運動的含糊性.....佛朗哥·特格利托
	35 拉丁美洲的反動潮流.....邁克爾·洛維
	37 在全國土著大會(C N I)和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 Z L N)的聲明之後：走向組織起來進行戰鬥的運動.....墨西哥工人革命黨(P R T)
	39 CADTM反債務政策史 第一部分：CADTM及其反非法債務鬥爭史：起源.....本傑明·勒蒙納、埃里克·杜桑
	43 第二部分：CADTM反對非法債務方法的第一批測試地： 盧旺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例子.....本傑明·勒蒙納、埃里克·杜桑
	46 第三部分：阿根廷 - 反對非法債務的進一步行動.....本傑明·勒蒙納、埃里克·杜桑
	50 第四部分：從急切的希望到厄瓜多爾的成功： 南非、巴西、巴拉圭和厄瓜多爾的例子.....本傑明·勒蒙納、埃里克·杜桑
英譯	55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the Dying Liu Xiaobo!Jun Xing
	56 Comment on the Work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Zhang Kai